

# 温州史志

WENZHOUSHIZHI

存史

资政

育人

2021年第1期  
(总第134期)

## ■ 史志要闻

- 03 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 07 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召开
- 09 陈伟俊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上强调：  
守好红色根脉，推进红动浙南
- 11 陈应许副市长在《温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图志》发行仪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6日）

## ■ 致敬模范

- 13 吴志宏同志先进事迹

## ■ 扶贫专题

- 16 传承红色基因 奋进全面小康  
——平阳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战  
平阳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 23 挖掘泰顺区域特色资源 加快全面小康步伐  
泰顺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 ■ 资政专栏

- 27 历史视域下的闽浙边合作问题初探  
——基于泰顺视角 谭桂涛
- 34 浙南籍早期先进分子对地方建党的贡献  
郑昌儒

## 目录 contents

### ■ 史志研究

- 41 《温州市教育志》评述 张声和
- 47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粟裕军事战略战术的  
丰富和发展 林依俐
- 58 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支点作用探微  
王志愿

### ■ 历史人文

- 71 南雁荡山脉的不老传奇 潘孝平
- 76 金钱会和江西垵 胡进士

### ■ 革命人物

- 84 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  
——谢文锦传略
- 91 不避艰险 坚贞不屈  
——郑馨传略

### ■ 诗意图州

- 96 《登池上楼》赏析

封 二：图片报道

封 三：孙诒让《学务本议》节录

张声和（书）

封底篆刻

蓝 潮



2021年第1期  
(总第134期)

#### 主办单位：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 《温州史志》编委会：

主 任：王文胜  
副主任：赵万磊 魏仕阔 吴 华  
张声和 张致光  
委 员：张林洁 郭东升 周婷婷  
陈 好 厉 靖 康丽跃

主 编：王文胜  
执行主编：吴 华  
副主编：张林洁  
责任编辑：陈 静 李 亮  
校 对：杨建明

地 址：温州市行政中心一号楼

电 话：88969628

传 真：88968777

E m a i l : chenj@zjds.org.cn

邮政编码：325009

出版日期：2021年3月

刊 号：浙内准字第C044号

印 刷：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 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20日上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持会议。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已经印

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对这项工作作出了部署，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特别是要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进程，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习近平指出，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

历史机遇。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必须从历史中

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要抓住建党一百年这个重要节点，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习近平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习近平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习近平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党要高度重视，提高思想站位，立足实际、守正创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承担主体责任，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率先垂范，成立领导机构，切实把党中央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中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要加强指导，省区市党委和行业系统主管部门党组（党委）要加强对所属地区、部门和单位的督导检查。党员、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要全身心投入，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二是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

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三是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皮”。四是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要发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明确学习要求、学习任务，推进内容、形式、方法的创新，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坚持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相结合，坚持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结合，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意为基层减负。

王沪宁在主持会议时表示，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思想深邃，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为我们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学习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各省区市和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班子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中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中管高校，军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等参加会议。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02月21日01版）

## 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召开

3月2日上午，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守好“红色根脉”、奋力争先创优、扛起“五大历史使命”，争当学史悟思的排头兵、增信崇德的排头兵、为民办事的排头兵、勇开新局的排头兵，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郑栅洁主持，副省以上领导干部、老同志和省属各部门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上，朱国贤就全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作说明。

袁家军指出，浙江作为“红色根脉”，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应该有更高的政治站位和政治担当，有责任有义务在党史学习教育上走在前列、当好示范。要扛起“红色根脉”和“五大

历史使命”的政治担当，增强党史学习教育走在前列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充分运用“红色根脉”的资源，发挥好“红色根脉”的优势，把学习党的百年历史与学习党在浙江的百年奋斗历史相结合，把党的历史学习好、领悟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袁家军强调，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智慧和力量，努力展现党的建设新气象。要学出政治定力，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做到忠诚核心、紧跟核心、维护核心，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展现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新境界。要学出知行合一，把学习党史与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持续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善于从“八八战

略”中找到工作的“船”和“桥”，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生动实践。要学出担当精神，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负起责任，把担当体现在改革突破、胸怀全局、率先探路上，展现敢为人先、奋勇争先的新作为。要学出为民情怀，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把为民服务落实到本职岗位上，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企业解难题、我为基层减负担”专题实践活动，着眼长远、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展现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新作风。要学出斗争精神，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信仰信念，增强忧患意识、底线思维，积极投身“七张问题清单”整改落实，在关键时刻、重大问题面前勇当战士、敢于碰硬，展现直面问题、防范重大风险的新突破。要学出过硬本领，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提升市县乡领导班子整体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坚持生成性学习、保持创造性张力，积极投身实践一线、改革一线、基层一线增长本领，展现面向现

代化、适应现代化、引领现代化的新能力。要学出高效组织力，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积极融入数字化改革，强化组织执行力，大力营造“唯实惟先、善作善成”的团队文化，展现高效协同、执行有力的新格局。要学出纪律严明，不断加强纪律教育，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守护纪律生命线，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展现讲纪律、守规矩的新面貌。要学出抵腐定力，把开展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教育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努力在构建“三不”一体机制上取得新进展，形成重点领域清廉单元建设的标杆示范，展现风清气正、干净干事的新气象。

袁家军强调，要建立组织领导机制、争先创优机制、闭环推进机制、学习教育转化机制，高标准高质量组织实施好我省党史学习教育。各地各部门要注重运用系统观念、系统思维，切实抓好全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贯彻落实，精心组织、有力执行，确保落地见效。

（文章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 陈伟俊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上强调： 守好红色根脉，推进红动浙南

3月10日，温州市举行党史学习教育教育动员部署会。市委书记陈伟俊在会上强调，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和省委“九学九新”的部署要求，坚定扛起“省一大”召开地的政治担当，紧扣锚定“五大新坐标”、开创“十个新局面”，勇争先、强执行、开新局，全面掀起“红动浙南”热潮，争当学史悟思的排头兵、增信崇德的排头兵、担当有为的排头兵、为民办事的排头兵、勇开新局的排头兵，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市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主持，市政协主席陈作荣、市委副书记陈浩等参加。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胡剑谨就全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作说明。

陈伟俊在讲话中指出，浙江是党的红色根脉，温州是“省一大”召开地，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有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大成效，在百

年党史中汲取思想伟力、政治定力、奋进动力，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上走在前列、做好示范。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坚定理想信念的“必修课”，持之以恒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作为增强历史自觉的“营养剂”，坚持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领航器”，带领人民群众开启奔向美好生活的新征程；作为创造新的伟业的“动力源”，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陈伟俊强调，守好红色根脉，推进红动浙南，在续写创新史中奋勇争先、担当作为、走在前列，重点要在八个方面“勇争先、走前列”。一要深刻领悟党的领导地位，在践行“两个维护”中勇争先、走前列。更加坚定信仰信念，在落细落小上更具体，在对标对表上更经常，当好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思想的排头兵。二要深刻领悟党的光辉历程，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勇争先、走前列。把握历史规律，在现代化先行中找准方向，在高质量发展中提升地位，在竞争力提升中促进升位，尤其要在创新驱动、谋大招强、安全发展上寻求新突破。三要深刻领悟党的战略谋划，在服务 and 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勇争先、走前列。对“国之大大者”了然于胸，融入大格局，深化大合作，构建大枢纽，当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开路先锋。四要深刻领悟党的初心使命，在探索推进共同富裕中勇争先、走前列。走出共同富裕新路子，务求为民服务新实效，回应民生保障新期盼，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五要深刻领悟党的奋斗精神，在担当作为破难题中勇争先、走前列。激发敢担当的精神，提升善担当的能力，展现勇担当的作为，以担当破难带动全市面上发展。六要深

刻领悟党的斗争精神，在强化风险闭环管控中勇争先、走前列。狠抓问题整改销号、风险闭环管控、重大事故防范，练就斗争的真本领。七要深刻领悟党的政治优势，在党建统领整体智治中勇争先、走前列。强化数字赋能，提升执行能力，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打响“瓯江红”党建品牌。八要深刻领悟党的鲜明品格，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勇争先、走前列。筑牢清廉基石，用好“四种形态”，强化建章立制，保持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陈伟俊要求，要健全完善“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构建层层落实的责任体系，发挥以上率下的头雁效应，创新务实管用的方式方法，形成系统集成整体效果，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打造温州样板、温州标识、温州成果。

（文章来源：温州发布）

# 陈应许副市长在《温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图志》发行仪式上的讲话

(2021年3月16日)

同志们：

去年的今天，正是温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清零”的日子，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重要时刻。在“清零”一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举行《温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图志》发行仪式。首先我代表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向参加这场严峻抗疫斗争的广大医务工作者、疾控工作者、公安干警、社区干部、志愿者、机关和基层党员、新闻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同心战疫、千里驰援的70万海外温州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守望相助、众志成城的全市930万父老乡亲送上诚挚的祝福！

回首这段特殊的抗疫历程，一个个难忘的瞬间历历在目。去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立即投入到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中。我们果断应对、赢得主动，通过“奋战十

天、拿下拐点”“再战十天、锁定胜局”“决战十天、力夺双赢”的有力举措，用29天实现本地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归零，用56天实现本地确诊病例清零，迅速遏制住疫情蔓延态势。同时，市委市政府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加强政策扶持，出台落实“惠企28条”“稳经济32条”“金融支持12条”“稳工业10条”等系列政策，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复苏发展，实现我市经济逆势反弹回升，交出了“战疫情、促发展”的高分答卷。

为全面记录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和战“疫”过程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去年我市启动了抗疫志的编修，并以征集到的4300多张图片为基础，同步启动图志编纂，以图志为志，铭记历史，致敬英雄。今天，这本抗疫图志已经刊印成册。图志用9章37节800幅图照，记录了一个个感人的

故事、一项项强有力的举措，展现出全市人民风雨同舟、携手并进，用真心、用温情、用坚毅合力守护家园的场景，是新时代温州人精神的生动写照。

当前，我们在持续紧抓疫情防控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快推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志的编纂工作，各承编单位要积极配合，认真报送后续

资料，市志办做好指导编纂，记录好疫情防控斗争的历程和经验，合力写绘就温州抗疫群像，为今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应对公共突发事件、推进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参考借鉴，充分发挥好志书资政育人的作用。

谢谢大家！

---

（上接第22页）

传统媒体和各种新兴传播手段，充分展现红色文化魅力，不断提高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

四要突出“以红助通”。要全力构建通达的老区对外交通网络，加快平阳动车站扩容提升工程建设，全力争取沿海高铁在平阳设站，开工平阳北互通、鳌江互通，尤其是要加快建设瑞平苍高速。要全力构建畅通的内部交通网络，加快推进104国道西过

境工程、228国道等国省道工程以及水头至闹村、南雁至顺溪二期、蒲山至满田等红旅道路建设，着力形成“三纵四横”县域快速路网和“七射十六连”的西部革命老区综合交通网络，并积极推进平泰、平文等高等级公路建设，加速构建西部对外交通网络。

（王祥执笔）

## 吴志宏同志先进事迹

编者按：吴志宏，男，汉族，1970年5月出生，1992年参加工作，200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云南省红河州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3月担任红河县三村乡党委副书记、三村乡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兼补干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2019年10月17日，在补干村委会南哈上寨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公开评议会上突发疾病，于2019年11月8日不幸去世，终年49岁。吴志宏同志是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的共产党员典型，他身上有着许多值得广为传颂的优秀品质，故本期《温州史志》收录吴志宏同志先进事迹，供大家交流学习。

吴志宏同志大学毕业后到红河州地方志办公室工作，27年如一日铁心修志编鉴，成果丰硕、质量过硬，创造了高质量的方志文化产品，为红河州地方志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7年的史志生涯，吴志宏一直默

无闻地扑在红河州地方史志和党史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中，参与、主持过红河州第一、第二轮志书和年鉴的编纂、编辑工作。他善于钻研、勤于思考，任劳任怨、勤业敬业，任何工作都能做到上手快、工作好、质量高。在两轮州志的编纂过程中，吴志宏任《附录》主编、编纂人员、校对。从1995年创刊《红河州年鉴》起，吴志宏几乎年年担任编辑、责任编辑、校对，还负责英文索引制作、英文翻译，同事都对他刮目相看。在他兼任年鉴编辑室主任期间，每年的《红河州年鉴》都能按要求做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吴志宏身上散发出的勤奋努力、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着同事们。“工作中，他任劳任怨、服从安排，从不推诿扯皮，只要是交给他的任务，都能做到按时、按量、按质完成。”

吴志宏同志还曾先后4次到基层挂职或任职，有6年多的时间在基层工



吴志宏（右二）入户了解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情况

作，其中3次到红河州最偏远、最艰苦的乡村工作。2018年，作为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到红河县三村乡开展精准扶贫。他夜以继日，全身心奋战在扶贫一线，努力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条件。他在驻村日记里写道：“作为驻村扶贫工作队员，要沉得下身、静得住心，用一点一滴的实事好事，赢得群众信赖，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他积极协调，为村民小组解决用水困难、改善村中环境脏乱差的情况、为新搬迁村民解决用电问题……吴志宏勤于调查研究，他深刻认识到产业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障，在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专家意见，组织党员干部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外出学习考察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贫困村产业发展计划。补干村的气候和水土适合种植花椒、辣椒、茶叶，养殖

牛蛙，他积极鼓励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花椒、辣椒、茶叶等产业。仅仅养殖牛蛙一项，到2019年10月，就带动26户159人脱贫致富。吴志宏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忙。他忙着加班，忙着走村入户，忙着访贫问苦，忙着排忧解难。他总是不辞辛劳奔波在脱贫攻坚第一线，不计饭点，不分昼夜，不顾寒暑，全身心扑在扶贫工作上。为方便开展扶贫工作，他把车开到了三村乡。短短22个多月的时间，这辆车在扶贫路上行驶了6万多公里，但他的父亲只坐过一次。

吴志宏同志对党忠诚，把践行初心使命作为毕生追求。在担任第一书记期间，他常对当地党员说：“作为一名党员，不能一天到晚混日子，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忘记初心，就不能忘记举起拳头时的誓言。”他对百姓真诚，即使妻子每月只有1700元工资，儿子还在上大学，家里十分拮据，但碰到困难的群众，他仍经常慷慨地拿出资金给予帮助，是百姓眼中的好干部。他对同事热情，主动分担急难险重的工作任务，毫无保留地为年轻同志传授经验、帮助工作，是同事口中的“老黄牛”“好大哥”。对家人他却陪伴得少，即使在2019年7月，其妻



吴志宏（左）核查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

子因误食有毒野生菌中毒住院的情况下，他也一心扑在扶贫工作上，未回到妻子身边陪护。

吴志宏同志在参加红河州委党校第十期中青年党员领导干部培训班时，曾在笔记本上留下“走好每一步，每一步都不能出问题”的誓言。他为三村乡贫困村脱贫兢兢业业、孜孜不倦，为实现全面小康不懈奋斗、矢志不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工作中的忙碌让他没有时间与亲人沟通

联络，与儿子偶尔的联系也都是在节假日的深夜时分。2017年3月，岳父在个旧病危离世时，吴志宏因为单位工作忙，仅回去了一下午，就匆匆赶回蒙自。2018年，他驻村扶贫时，上有70多岁的老父亲，妻子身体又不好，儿子面临高考，但是他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吴志宏生前曾对家人说：

“人去世后把器官捐献掉，能让别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如果自己有一天离世，也会选择这样做。”在他救治无望之际，家属经过商议，一致同意满足他生前捐献器官的愿望。11月8日上午，经过3个多小时的手术，器官获取成功。杭州、昆明等地5名器官受捐者均成功手术，其中3名器官衰竭者重获新生，2名失明者重见光明。吴志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自己的大爱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生命厚礼，让生命的价值得到了灿烂的绽放。吴志宏生前把一心为民的执着、无私无畏的胸怀献给了红河人民。

（文章根据吴志宏同志相关事迹整理）

# 传承红色基因 奋进全面小康

## ——平阳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战

◇ 平阳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平阳县是“革命老根据地县”，是中共浙江“省一大”召开地、浙江新四军北上抗日出征地、浙江全境解放完成地，素有“浙南红都”之誉。平阳的山门、凤卧一带曾是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浙江省委的活动中心，是刘英、粟裕等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南方八省十四个根据地的重要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平阳县属于经济欠发达县，据1983年数据显示，全县地区总产值2.27亿元，农民人均收入仅325元，贫困人口250952人，计56146户，绝大部分分布在革命老区。

2019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车俊来到革命老区山门镇和凤卧镇，参观了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陈列馆、举行了纪念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80周年座谈会、出席了省委党校平阳分校启用仪式并揭牌、

考察了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史馆，对纪念活动及相关筹备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车书记在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同步推进乡村振兴与老区振兴、红色引领与绿色崛起，让老区成为群众生活的幸福家园。值得一提的是，平阳水头水患治理事关平阳革命老区40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车书记对此非常关心，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两次到水头镇调研，多次作出批示，对水患治理提出明确要求。2020年7月，车书记在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还专门视频连线平阳县水利部门负责人，听取水头水患治理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平阳水头平原排涝工程已经完工，可防御“20年一遇”级别的洪水。

近年来，平阳县委、县政府坚决贯彻落实车书记对平阳革命老区脱贫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新阶段、研究新形式、采取新举措，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细的工作，为革命老区“造血输血”，使老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2020年1月开始，平阳低保标准从2018年的664元/月/人提高到804元/月/人，大幅高于国家平均水平。2019年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达10861元，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率先在全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 一、主要做法

总结起来，平阳能打赢这场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战的主要原因，是做好了以下“五篇文章”。

（一）做好“制度强化脱贫”文章。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精准”“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等扶贫工作要求，建章立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一是强化扶贫工作领导。优化调整了平阳县扶贫和老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县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县委分管副书记、县政府分管副县长担任副组长，出台了《平阳县扶贫和老区工作领导小组议事规则》，及时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切实强化对扶贫工作的领导。二是强化部门沟通协调。严格执行《关

于实行精准扶贫责任捆绑制度的通知》《关于建立平阳县精准扶贫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平阳县扶贫和老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的通知》等制度，促进全县各级部门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自觉依法依规履行扶贫工作职责，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扶贫各项目标和任务。三是强化扶贫规划贯彻。结合平阳实际，认真实施《平阳县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2018—2022年）》，低收入农户从2017年的46569人下降至2019年的20741人，低收入农户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四是强化扶贫工作措施。严格执行《平阳县村集体扶贫产业收益资金管理办法》《平阳县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平阳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等政策，进一步完善《低收入农户帮扶手册》，对8个部门6个方面17项帮扶政策进行重点解读，精确宣传扶贫开发政策，提高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知晓率。五是强化扶贫信息共享。完善老区各乡镇低收入农户认定多部门联动机制，建立扶贫信息动态管理系统，实现农业农村、民政、民宗、教育等部门间信息共享，2019年完成老区两轮低收入农户动态调整，做到精准识别、精准施策。

(二)做好“政策推动脱贫”文章。近年来,平阳县委、县政府切实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工作力度、帮扶力度,整合各种政策资源,合力推动革命老区脱贫工作。一是推动搬迁扶贫。为进一步完善革命老区搬迁户置换安置地和资金补助优惠政策,平阳县按照群众自愿的原则,实行自然村整体搬迁、宅基地同步复垦,补助标准从人均5600元提高到30000元;并按照温州市“安居圆梦”政策,每户给予3万元补助,县财政在省市补助的基础上每户再补助7500元。同时扩大老区人民群众搬迁安置小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提升就业条件,在没有就业条件的扶贫搬迁集聚小区附近,引导来料加工等就业门槛低的企业进驻,解决家门口的劳动力就业问题,让老区群众真正“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2019年末,集聚小区已安置搬迁人数3579人,占总搬迁人数的50%。二是推动医疗扶贫。为解决老区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难题,平阳县把老区低收入农户补充保险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加大补充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实现医疗补充保险签约率达到全覆盖。医疗补充保险主要是对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目录外超过

2000元的部分赔付60%,最高赔付不超过2万元,对住院医疗给予50元/天的补助,且与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不交叉,进一步减轻了老区低收入农户的医疗负担。三是推动金融扶贫。针对老区低收入农户发展缺乏资金支持和抗风险能力的痛点,平阳县积极开展金融帮扶工作,成立了53家村级资金互助会和1家来料加工扶贫资金互助会,并进行统一管理、统一协调,最大程度发挥资金互助会的功能与作用。2019年末,平阳县累计向老区低收入农户会员发放贷款1244笔2156.3万元,帮助1000余户增收创收。同时,继续发挥扶贫丰收爱心卡的带动作用,2019年末,平阳县通过爱心卡借贷280余笔1000多万元。四是推动“消薄”扶贫。采取企业结村、部门包村、干部蹲村、乡贤帮村等方式,推动各方力量集结老区“消薄增收”第一线,落实乡贤项目564个、投资额143亿元。全面深化“山海协作”,加快抱团项目建设,与乐清合作共建“消薄飞地”项目的参与村由12个增加至30个,截至2020年1月,已有4个县域山海协作项目开工建设,并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落实用地38.16亩用于集体经济项目。定期组织“比学赶超”竞赛,2019年全县村级集体经

总收入5.18亿元，同比增长36.3%；经营性收入1.75亿元，同比增长44.2%，经营占比33.8%。

（三）做好“综合开发脱贫”文章。平阳县于2016年开始实施资产收益扶贫项目，截至2019年末，重点打造了革命老区“腾蛟镇十村联建厂房项目”“麻步镇生猪养殖折股量化项目”“闹村乡花边生产折股量化项目”等整乡制带动项目82个，为实施省级综合扶贫项目试点积累工作经验。一是精准打通产业扶贫“主渠道”。革命老区闹村乡有7个省级扶贫重点帮扶村，1066名低收入农户，弱劳动力和无劳动力人数78.5%，平阳县依托麻步镇花边产业优势，出资从麻步江湾轻工业园异地购置村集体花边标准厂房，通过生产或出租获得经营和租金收益，带动革命老区低收入农户就业和分红收入，有效促进了革命老区闹村乡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二是开创扶贫产业开发“新模式”。革命老区“腾蛟镇十村联建厂房项目”是平阳首个谋划抱团联建厂房项目，是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的生动实践。为解决腾蛟镇省级重点扶贫帮扶村集体经济防滑消薄问题，由该镇申请落实土地和前期政策处理，经县财政、农业部门审核报省扶贫办备案，并拨

付扶贫资金建设厂房项目后用于生产和出租。三是增添乡镇谋划项目“新动能”。平阳各级扶贫专项资金着重向革命老区倾斜，按革命老区乡镇低收入农户人数和省级重点帮扶村数的不同下达各乡镇。同时，对革命老区乡镇扶贫项目实行两月一通报制度，并将该指标列入当年年度考核。截至2019年末，已进行了5次通报，对谋划项目不积极的，报送县委、县政府、县纪委以及有关部门，促进乡镇落实扶贫主体责任，对革命老区乡镇起到了明显的触动作用，增强了老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四）做好“红绿结合脱贫”文章。平阳依托革命老区丰富的红色资源，做深做实红绿结合发展文章，形成了较好的红色产业发展基础。一是红色教育品牌在全省打响。随着省委党校平阳分校的设立，平阳的红色教育品牌逐步在全省打响，先后获得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军小学培训基地、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基地、浙江省红色旅游教育基地、省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浙江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浙江省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示范基地、中共温州市委党校红色教育中心、老区传统

革命教育基地等红色教育牌子。2019年，承接了厅长班等省级主体班次、温州市四套班子读书会和112个省内、外班次，参训学员超6000人，教育成效大受好评。2020年7月，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强、曾林平等一行30人也选择了在平阳举行“不忘初心、决胜小康”主题党日活动。二是红色旅游发展水平逐步提升。浙南（平阳）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园、中共浙江省一大纪念园创成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凤卧镇凤林村等一批红色主题村庄创成省AAA级旅游景区村，浙南（平阳）抗日根据地旧址群，被列入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一和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并获国家AAAA级景区创建“入场券”。平阳还通过举办重走红军路、红色文化旅游节、红色旅游系列宣传活动，持续带火了红色旅游。2019年，仅省一大纪念馆和会址就接待党员群众15万余人次，同比增长70%以上。三是红色产业引领作用逐步增强。随着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持续发展，有效激发了社会资本参与红色产业发展的积极性，2019年，平阳列入温州市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的26个重点项目，综合投资完成率100%，列全市第一位。建成投用红都绿野精品

带和4条乡村振兴示范带，完成投资超10亿元。在红色旅游持续带动下，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增长24.1%和28.4%，入选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革命老区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增长50%，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9.7%，均列全市第一位。

（五）做好“两会助力脱贫”文章。多年来，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革命老区发展建设促进会（简称“两会”）通力协作、共同努力，为弘扬铁军精神和老区精神，致力于推动平阳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发挥了各自应有的作用。一是致力于宣传老区。从2007年《红色平阳》出版发行以来，每期内容都十分重视对老区的宣传，将老区工作放在版首“最前沿”阵地进行宣传，发送到平阳各机关、学校，目前已发行了42期。特别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赴平阳参加纪念“省一大”召开80周年系列活动，平阳专题推出了《纪念省一大召开80周年特刊》，对平阳16个老区乡镇进行专题报道，对宣传老区光荣历史、宣传老区光辉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致力于了解老区。“两会”把调研作为真正深入了解老区和老区群众的重要抓手，每年都安排10多次专题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呈送县领导和

相关部门参考，帮助解决问题，达到助推老区发展的效果。如，对平阳西部欠发达乡镇来料加工业发展情况调研提交县政府后，县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决定每年财政补助200万元支持来料加工业；给予涉禽企业马头岗村百亩梨园蓄水池建设经费补助等。三是致力于服务老区。茶产业连接着山区千家万户的利益，“两会”在积极调研的前提下，协助在杭召开敬老茶会，并请省委老书记薛驹为平阳题写“平阳黄汤”招牌，扩大平阳黄汤的影响力。县财政将200万元转到省老区基金名下，现每年有20万—30万元扶助资金到账，每年都安排10个扶助点，虽然不多，但也能解“燃眉之急”。经过“两会”多方努力，凤卧红军小学被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列为创作基地，山门红军小学被省老促会浙南分会列为联系点。上半年，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培训基地又获批创设，地点位于山门的浙江省委党校平阳分校。

## 二、存在问题

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平阳革命老区脱贫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老区相对低收入农户人口脱贫与返贫相互交

织问题突出，尤其是生大疾病、重度残疾等致贫现象交替出现，动态管理难以完全到位。二是西部革命老区交通短板尤其突出，当前拥有40多万人口、红色资源集中的西部革命老区尚未通高速公路，与东部地区之间缺乏便捷快速的通道。三是红色教育尚处于培育期，主要靠党委政府支持，红色教育和当地产业结合不够紧密，旅游人数的高速增长未能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对西部革命老区人民就业增收带动作用还不明显。

## 三、意见建议

平阳的红色资源在全省具有唯一性，在全国具有代表性。下面就如何通过开发利用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优势，引领和带动老区群众全面奔小康谈以下四点建议：

一要突出“以红带旅”。以老区红色旅游发展为引领，推动全域旅游大发展。要深化“研学+”模式，联动推进红色节庆体验、红色运动拓展、红色文化创意等红色旅游项目开发，加快推进凤林红色度假休闲村、大屯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建设，着力打造知名研学旅游目的地，全面提升红色旅游整体品质。要优化“红色+”模式，加强旅游规划编制，大力发展“红色+

绿色”游、“红色+人文”游，着力打造多元化、复合型旅游产品体系，让游客在接受红色教育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平阳的秀美山川和深厚底蕴。要强化“营销+”模式，以党委政府为主导，常态化开展宣传推介活动，增强红色区域旅游的吸引力和关注度。同时，加强与各大旅行社、专业旅游运营团队以及各类媒体的合作，进一步激发旅游营销的积极性，提升平阳旅游知名度、美誉度。要探索“区域+”模式，加强平阳与永嘉、文成、泰顺等红色旅游景点的跨区域合作，共同打造旅游线路，推动旅游市场共建、旅游产品共销。

二要突出“以红促农”。要重抓老区乡镇的业态融合，做强茶叶主导优势产业，提升发展水果、蔬菜、优质稻米、林业和生态养殖业五大特色产业，培育发展农家乐民宿经济，以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乡村振兴示范带“两条带”为主要区域，加快旅游资源与农业产业资源串点成线、集聚发展，推进西部绿色崛起，实现更均衡、更充分、更全面发展。要重抓品牌营销，制定实施十大农产品标准，持续提升“平阳五个鲜”区域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产品附加值；要在山门、凤卧等乡镇建立农副产品展销

中心，扩大平阳农产品的宣传范围和销售市场。要重抓经营保障，建立完善土地流转管理和服 务制度，加大土地流转力度，促进老区农村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集成发展。

三要突出“以红兴文”。红色文献保护要突出专题化，要设立地方红色文献专题资料库，强化珍贵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并加强对地方特色革命文物和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研究要突出精准化，要加强平阳红色文献研究，为平阳红色教育和红色旅游的发展提供科学有力的支持；要认真提炼红色文化精神，注重提炼符合平阳本土特色的精神文化，展现平阳元素。红色精品创作要突出特色化，要制订出台文艺精品创作扶持奖励办法，推动社会各界讲好平阳红色故事，弘扬平阳红色文化；要加快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整合，把红色文化元素融入文创产品开发和文化旅游基地建设 中，全力打造红色旅游文化系列精品和著名品牌。红色文化传播要突出立体化，加快演出场馆建设，常态化开展跨区域红色文艺精品展演、交流，统筹运用

（下转第12页）

# 挖掘泰顺区域特色资源 加快全面小康步伐

◇ 泰顺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泰顺县位于浙江省南部，东邻苍南县，东南界福鼎市，南界柘荣县，西南、西侧分别与福安市、寿宁县接壤。县域总面积1761.5平方公里，现辖12镇7乡，总人口37.1万人。泰顺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也是革命历史悠久的“红色之地”，1988年被命名为“革命老根据地县”。泰顺革命历史源远流长，1935年4月，刘英、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进入泰顺，与叶飞领导的闽东独立师胜利会师，在九峰白柯湾村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开创了一段难以磨灭的光辉历史，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目前泰顺境内仍保留着20多处革命胜迹。

解放前，“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泰顺，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民生困苦；新中国成立后，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泰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振奋精神、奋发进取，经济文化发展迅速。近年来，泰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激扬新时代温州人精神，结合县域实际，挖掘区域特色资源，在脱贫攻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取得累累硕果，走出了一条山区县奔跑追梦的独特道路。

## 一、挖掘特色自然资源

泰顺群山连绵、峰峦如聚、溪水潺潺、林壑幽美、修竹林立。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下，有一批特色自然资源，泰顺人民化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兹通过以下几例来管窥发展中的勤劳智慧。

### （一）猕猴桃，大市场

猕猴桃是泰顺五大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它味美汁多，富含营养价值，受到消费者的喜爱。泰顺县猕猴桃种植始于1983年，现种植面积2000

余亩，产业在起初发展的20年里，基本处于自产自销状态。2005年开始，产业发展趋向产业化和规模化，种植面积扩展至1.2万亩，年总产值1.1亿元，旅游年收入1000多万元，吸收劳动力8000多名。当前，猕猴桃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渠道之一，“泰顺猕猴桃”已成为知名区域品牌。果农还及时将现代媒介融入营销模式，拓宽商品市场。以碑排社区陈国山为例，2015年，他创办“泰顺县两只猴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销售泰顺特色农产品为主，通过提高猕猴桃的附加值，来拓宽销售渠道。仅2018年一年，他就帮助同村的种植户销售猕猴桃近3万公斤。接下来，泰顺将继续实施猕猴桃产业“123工程”，即：从业果农1万人、种植面积2万亩、年销售额3亿元，提升产业品质，形成更为完备的产业链。

### （二）栀子花，大价值

彭溪镇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种植黄栀子。该作物植株矮、不怕台风、易于管理，又正好能利用彭溪多山坡地貌的特点进行大规模种植。2020年，种植面积8000余亩，吸引3500多户农民从事该种植行业。花农还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当地茶叶、黄栀子结

合，创新出“栀子花茶”这一新产品，既受到市场一致好评，又提升了产业附加值。自2016年开始，彭溪镇还拓宽栀子花价值，凭借8000亩黄栀子，将观赏游览、“花宴”美食等结合在一起，打造农旅融合的“花海经济”。还引进浙江康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其药用价值，研发冷凝皂、纯露等日化系列产品。2020年，该企业计划投入7000多万元，完成办公楼、厂房建设等设施配套建设，做好部分设备引进；并改良种植基地3500亩，完成游步道、停车场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将产业做大做强。

### （三）绿竹美，增收益

泰顺有丰富的竹木资源，全县竹林总面积25万亩，立竹量4000多万株，年产竹材250多万支。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顺就开展竹资源开发活动。近年来，通过科技兴竹战略，加大竹产业投入力度等有效举措，积极推进竹产业发展。2019年，通过招商引资，延伸竹产业链，引进主材首台（套）技术装备应用项目，推动竹产业做大做强。浙江利众竹木有限公司是泰顺竹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该企业建于1988年，主营竹餐具，兼营竹家具、竹厨具等。当前，该公司有厂房3.5万平方米，年加工毛竹220万株，年产值约8000万元。该企

业还对群众免费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就业增收。在政府政策扶持下，在“利众”等企业推动下，当地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5年前的不足4000元，提高到近20000元。2020年，泰顺还将建成竹材生态产业项目，集科研、生产、经营于一体，届时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以上，创税2000万元以上。

## 二、挖掘人文资源

### （一）依托廊桥文化，提升旅游品质

廊桥，是泰顺的一张金名片。泰顺依托廊桥文化，把文化、旅游结合在一起，推动文旅联动发展。以泗溪镇为视阈，2017年起，泰顺加快廊氩“国字号”景区创建，投资1.93亿元，在该镇铺开新一轮景区提升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该镇获评“首批浙江省旅游风情小镇”，为温州首例。2019年，泗溪镇接待游客140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实现旅游综合产值4亿元。2020年，泗溪镇入选浙江省首批“AAAA景区镇”。廊桥文化园已成为泰顺廊桥旅游的“王牌景区”。接下来，泗溪镇计划投入约5500万元，推进文昌阁、泰顺乡学院、十八学士盆景园、游步道等基础工程建设，提升旅游品质。

### （二）弘扬民俗文化，拓宽效益空间

泰顺有富有特色的民俗文化，如百家宴、畚乡“三月三”等。泰顺百家宴始于北宋时期，由宗族内部祈祷仪式“做春福”演变而来。今天，“祈祷”的色彩逐渐褪去，而凝聚人气、畅叙乡情、欢迎四海宾客的文化内涵逐步开始形成。2007年，泰顺就因“百家宴”的风俗文化被确定为“浙江省元宵节传统节日保护示范地”。2009年，“百家宴”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0年元宵节，泰顺百家宴规模超过6000桌，入席客人逾6万人，被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2019年，三魁镇游客接待量20万余人次。依托百家宴民俗文化形成的产业有：精品民宿、主题餐厅、文创商铺等。在民俗文化推动下，近年来，三魁百货、服装、农贸等传统行业焕发生机，非遗传承人、文艺工作者、文创设计企业获得更多发展机会。2020年，三魁创新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开启百家宴市场化运营之路，并带动全镇旅游发展实现转化升级；同时还启动百家宴文化展馆、文创产品创作大赛、百家宴旅游线路等百家宴品牌提升十大工程，把千年的百家宴文化转化成旅游新业态。

### （三）融合传统工艺，振兴乡村经济

泰顺是传统工艺比较发达的县份。拥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项（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国家级非遗项目6项（畲族民歌、药发木偶戏、提线木偶戏、碇步龙、木偶头雕刻、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省级非遗保护项目15项，市级非遗保护项目102项，非遗传承人队伍300多人。其中国家级传承人6名，省级24名。泰顺大安有数百年制陶历史，尤其是大丘坪村，保存着较完整的柴窑和大批古民居，保留着传统的手工制陶技艺。2017年，大丘坪村入围浙江省第一批传统村落。在政府引导下，土陶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一把钥匙。大安乡召集民间土陶制作技艺传承人，通过开设土陶传习区、制作体验区、烧制区等方式，将传统的土陶非遗技艺在村里进行“活态”展现，打造特色“土陶文化村”。非遗文化带“火”了乡村旅游。2019年，共接待当地群众和游客11万余人次。大丘坪土陶文化村成为泰顺文化旅游新地标，并获评“浙江省非遗旅游景区”。

### （四）传承红色文化，加快前进步伐

泰顺是一块有着悠久红色历史的光荣土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英、粟裕等曾在三魁镇卢梨村战斗、生活，

当地建有革命历史纪念馆，保存寨顶战斗旧址。近年来，在政府的帮助支持下，卢梨村提高红色文化挖掘开发力度。该村刘英、粟裕办公旧址、红色文化礼堂、红军学校、寨顶战斗旧址、红军古道等红色革命资源被有效整合，建设出浙南红色实践基地，集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实战体验、干部培训和休闲旅游等为一体。为吸引外地游客到来，县里投入800多万元拓宽三凤线，方便旅游大巴进出；投入400多万元，修缮红军古道；投入200多万元，实施村庄环境建设。该村举办浙闽户外千驴“重走红军路”大型徒步活动、“端午民俗红色文化旅游节”等。记录片《挺进师》70%以上场景在该村拍摄。旅游业的发展，对村里餐饮业、农产品销售等都带来了极大提升。2018年，村集体收入超50万元，经营性收入超8万元。当前，卢梨村在大步追逐“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卢梨梦。

全面小康征程中，泰顺人民不等、不靠，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高昂姿态、务实精神，在充分了解地情的基础上，挖掘特色资源、突出自身优势、走出特色之路，推动县域经济文化绿色高质量发展，是山区县份破局提升的优秀案例。

（谭桂涛执笔）

# 历史视域下的闽浙边合作问题初探

## ——基于泰顺视角

◇ 谭桂涛

闽浙边地区山水相连、地情民情相似，数千年来有着长期的交流合作经验与紧密联系。在新时代的今天，加强闽浙边合作，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切合本区域实际、具有光明前景的发展之路。边区各县份可进一步强化合作意识、拓宽合作领域、密切合作程度，加强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取得高效发展。

闽浙边，从行政区划角度看，涉及到福建与浙江两个省份，但从自然环境、地理特征、人文特质等角度看，实为一个整体。数千年来，边区各县在人口迁移、商品流通、思想传播、婚姻交往、政治活动等方面均保持着紧密联系，且相互间不断提升优势互补程度。2020年，泰顺县委提出打造“新时代闽浙边合作发展先行

区”的总体部署，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充分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指导性的发展战略。本文拟大致梳理闽浙边合作的历史经验，为今后闽浙边的合作提供借鉴参考。

### 一、古代：山水相连，清音互闻

据考证，泰顺百丈下革牛头岗、司前狮子岗、莒江山头垵、新山寮头锦边山等地所存留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字符号，与福建昙石山遗址的刻画文字相似。究其原因，现存两种猜测，一是从前两地可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二是可能同一群原始居民迁移分居在两处。无论何种猜测为真，都可说明泰顺县自古就与福建北部村落有着紧密的联系。

泰顺是典型的移民县。从人口来源的角度看，泰顺人口主要来自浙南

或闽北。以家族为例，唐宋时期，黄族自长溪县(治所在今福建霞浦县岭尾庵)迁入泰顺百丈双岭村一带；周兴二自周墩（今福建宁德周宁）迁入今泰顺洲岭；翁神自长溪县迁入翁山。从方言类型的角度看，泰顺县内语言类型繁多，有的与福建南部、西南部、北部、东部的多种方言类似。

古代，闽浙边文人之间存在着学术文化交流。以徐奭为例，他在父亲带领下，迁居到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市），因当地书院众多，教育相对发达，名儒荟萃，科举成功率相对高。在建安学习期间，受良好文化氛围影响，他学业大进，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在建安参加发解试，并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参加殿试并折桂。

明景泰年间，泰顺立县。县城所在地的选择，体现出泰顺致力加强闽浙边联系的宏大格局。根据泰顺地图地形，单纯从加强县内联系看，泗溪镇处于最中心位置，应是县城首选，但最终选址罗阳，是因为考虑到该地虽不是正中心，却被称为“三州六县之咽喉，险阻之枢轴处”，具有重要交通位置和战略地位。自罗阳东出，可进入早期的飞云江航路。自罗阳东出再折北行进入东坑，可到后来的景

宁县城。自罗阳西出，可到达后来的寿宁县。

明清时期，泰顺与闽浙边相关县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一是农作物的传播。泰顺的番薯就是从福建传来的，番薯又名甘薯，原产于美洲，新航路开辟后，被欧洲殖民者传入东南亚一带。明万历年间，番薯自菲律宾传往福建，大约在康熙年间自福建传入泰顺，这种高产作物逐渐成为贫苦农民的主要粮食。直到今天，地瓜粉仍是泰顺人喜爱的一道小吃。二是手工技艺传播。清代，泰顺司前、竹里、黄桥、碑排、岭北等地造纸技术高超，该技术很快传入福建寿宁等地，使之成为土纸生产基地。三是建筑方面的合作。清嘉庆五年（1820）建造的普宾桥，位于雅阳镇新久村，建桥时曾得到泰顺、寿宁、福鼎、柘荣等毗邻各县群众的捐助。雅阳百福岩村，一座显眼的石门楼以及相邻的一座民居，都吸收了闽北建筑风格。四是交通联系密切。清乾隆年间，福鼎县城桐山商业功能辐射到泰顺，尤其是泰顺南部。此时期，泰顺重要商业乡镇百丈口成为闽浙之间交往的重要基地。董正扬写的“百丈清溪口，双篷大出船。估客来闽困，篙师出长年”就印证了当时福建地区的商人

也有到过此处。泰顺生产的茶叶、瓷器、土纸、靛青、柴薪、木炭，福安生产的红糖等，经洪口溪、司前溪等水路，运到百丈口，再装船外运。温州城区、瑞安、平阳等地的食盐、水产品、副食品、手工业品等，经飞云江水路，运到百丈口，然后卸船，运到泰顺各地，也运到景宁、寿宁、庆元等临近县。

纵观整个古代时期，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背景下，泰顺与闽浙边县份仍保持着相对密切的经济联系，并加强文化交流。与福鼎等地的联系的加强，使得泰顺的经济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山地经济，而是呈现山海经济的雏形，县域文化也取得了相应的进步。

## 二、近代：携手发展，并肩作战

近代，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之中，中外经济联系加强。受西方科技影响，中国的交通运输、通信事业也在不断进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泰顺与福建地区的联系也随之得到了加强。

### （一）商品流通加强

“闽客之赴瓯者，往来多取道焉”，近代，泰顺是福建商人通往温州的中转地之一。“贫民既得以肩

负食力，富者亦藉转运茶、铁以起家”，这些闽商在路过时，往往会顺便收购泰顺的茶叶或其他经济作物，这为泰顺本地人提供了许多的就业机会，助推泰顺商品经济的活跃。

泰顺与福鼎县城桐山镇的联系尤为密切。桐山镇是闽东北地区的重要港口，距泰顺县界仅几十公里，在浙闽贸易中发挥枢纽作用。泰顺南部的三魁、雅阳、泗溪、仕阳、龟湖等乡镇，到桐山甚至比到罗阳还近。泰顺南部乡镇，往往把货物运到桐山，再转运到更远的区域，桐山的百货、煤油、肥皂、鱼、盐等物资，也销售到泰顺，福鼎的海产品在泰顺备受欢迎。晚清时期，任教于泰顺的宁波知识分子郑传芑记载，每年的冬季之初，当福鼎海产品进入泰顺后，人们“喜色相告”，可见，桐山是泰顺人通往沿海和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泰顺北部的百丈，也是闽浙边地区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百丈是泰顺县内飞云江航道的起点，自此出发，可以走水路至瑞安与温州城区。由于水运方便，闽浙边地区的寿宁等县的商人也将山货运到百丈，再转温州，再将百丈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入本地县份。当时，泰顺规模最大的乡镇不是罗阳，而是百

丈。该镇2000多名固定居民几乎都开店做生意或从事相关服务业。可见，泰顺也是闽浙边联系加强的受益者。

### （二）劳务交流密切

近代，泰顺民众面对山多田少、人口增加的现实问题，纷纷外出务工以增加收入，长此以往，泰顺不同乡镇就形成了各具专长的工匠群体，例如：仕阳石工、泗溪弹棉工、战州土工等。除在泰顺劳作之外，他们还到福建寿宁、霞浦、福鼎、福安等地谋生。据吴松弟教授研究，近代泰顺三魁的薛宅、张宅、秀溪边等村庄都是著名的工匠之乡，而村民们外出务工的地方则多以闽浙边的福鼎、霞浦、福安等县份为主。

当挑夫也是近代泰顺农民劳务谋生的方式之一。1958年公路修成以前，泰顺陆路货运全靠肩挑。很多挑夫在出卖劳动力的同时，也行走于各个县城，兼营小商品买卖。他们将货物挑到泰顺百丈、福鼎桐山等商品集散地之后，许多人还就地购入洋货、食盐、水产品等，再挑到寿宁、庆元等县出售，此后再将这些县的香菇、笋干、纸等山货特产挑到泰顺、瑞安、平阳等县出售，以赚取差价。工匠、挑夫等群体加强了闽浙边区的劳务交流和商品流通，成为边区经济元

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三）革命互相配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闽浙边地区联系紧密，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

在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看来，闽浙边是一个整体。1935年10月，红军挺进师、闽东红军独立师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指出连国民党也已成立所谓“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加强边区协作能力，红军更应该对其进行强化，将浙闽游击区统一起来，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员会”。国共双方、敌我双方都有加强边区合作的意识，说明了边区合作的重要性。1940年，在隐蔽精干斗争中，浙南特委专门成立驻浙闽边办事处，旨在加强对泰顺、福鼎、鼎平3个县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泰顺与周边县份联合成立鼎泰区、寿泰县委、霞鼎泰县委等，打破县域界限。

革命思想的春风，在闽浙边各县互相吹拂。1931年，福霞上西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陶生在泰顺葛垵、上垵等21个村和离罗阳约3公里的川山洋等地成立贫农小组，发动群众抗租抗债、维护自身权益。1936年，福鼎县城关岭头下洋村党员刘宝生受瑞平

泰县委安排，到泰东南区开展革命工作。

革命军队在边区各地转战，打破县域界限。1933年，叶飞等率革命武装在寿宁西区（泰顺边界）、东区先后开展武装暴动，遭到敌人残酷镇压。为躲避追捕，一部分起义人员转到泰顺、柘荣一带开展工作。1934年，闽东特委、闽东独立师骨干范式人、范义生等在泰顺边界一带活动，并安排人员到顺洲边境一带打击地主恶霸、建立党组织。革命军队多次从福建出发，攻击泰顺的敌人。1934年，王陶生等带领警卫连270多人从柘荣出发，进攻泰顺排头的敌人，杀敌30多人、缴枪27支。有时，革命军队从泰顺出发，袭击闽浙边区其他县份的敌人。1948年10月，浙南游击纵队第三县队第一分队在林永中的带领下，袭击并焚毁国民党福安县白石镇公所。1935年至1938年间，曾在福鼎、寿宁等地奋战过、并献出宝贵生命的泰顺籍烈士有115名。解放战争期间，泰顺县委警卫队由泰顺、福鼎、鼎平3个分队组成。1949年5月，泰顺中心县委、泰顺县民主政府筹备委员会为了泰南地区工作的开展，还加强对福鼎县委、鼎平县委的工作指导。1949年5月，泰北区民兵前往福建寿

宁县，攻打坑底乡的敌军地方武装，攻克碉堡2座，缴获一批枪支弹药。6月，泰顺中心县委还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福鼎、柘荣两县的接管工作。县委书记陈辉率县委警卫队、机关干部100多人，到分水关与解放军汇合，一起进驻福鼎县城，协助福鼎县委开展接管工作。接着，泰顺中心县委还协助柘荣县的接管工作。

正是这种不分轩轻、精诚团结的精神与做法，让闽浙边各县份紧密配合，在携手作战中加快本地区的解放进程。

### 三、新中国成立后：深化合作，共筑未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闽浙边区各县份加强合作，开展好巩固政权等斗争。1950年，杜谋平、吴宗论等顽匪20多人在福鼎金沙溪村，劫去福安中心支行给福鼎县支行的现金50万元。泰顺仕阳乡农会主任发现有土匪向严山方向逃窜，立刻报告福鼎方面，福鼎方面公安武警旋即向泰顺集结，与泰南区中队一起追击。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剿匪斗争在1951年底胜利完成。1950年至1952年，边区各县都能参与到反对恶霸地主的斗争中来。

20世纪60年代，国内外形势严

峻，蒋介石集团妄图“反攻大陆”，泰顺离福建作战前线近，且高山纵横，防空战略意义重大。1961年8月，泰顺与福安、福鼎联合组成“反空降、反暴乱”联防指挥组织。1964年7月，福安、温州联防指挥部在泰顺开展“反空降实弹战术演习”，泰顺、福安、柘荣等县9个基干民兵连1000多人参加。

林木保护方面，闽浙边区各县份也加强联系。1958年，浙闽联防会议确立成立护林联防区。其中，泰顺、福安、福鼎、平阳为一个联防区，以泰顺为主；寿宁、泰顺、庆元、景宁等为另一个联防区，以寿宁为主。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国家在较长一段时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闽浙边各县份依然保持着商品流通。百丈口、洪口是泰顺和寿宁、福安等县商品交流的中转点，泰顺运出的一般是竹材、木材、木炭、茶油、茶叶、花笺纸等，外地销往泰顺的一般是海货、食盐、布匹等。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委发布《关于开展农村集市贸易的通知》，1961年，泰顺集市贸易得以迅速恢复，来泗溪、仕阳、三魁等地开展农副产品交易的，除泰顺本地人外，还有很多寿宁等县的农民。

20世纪90年代，边区各县围绕教

育的交流更加紧密。1991年5月，泰顺、寿宁、柘荣、景宁、苍南、文成六县联合召开浙闽边重点中学校长协作会。7月，泰顺一中、长乐一中、寿宁一中优秀学生干部夏令营活动在寿宁一中举行。1992年5月，泰顺一中组织部分教师到福建长乐一中参观学习。8月，泰顺一中、寿宁一中、长乐一中在泰顺一中联合开展优秀学生干部夏令营活动。1994年7月，泰顺一中党支部组织部分党员教师前往寿宁一中参观学习，交流范围包括办学思想、学校管理、学生干部成长、教育教学、党建德育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之后，闽浙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深化合作。2020年，泰顺县以积极进取的高昂斗志，以更高格局把握发展思路，结合地处浙闽交界的地理区位优势，全力打造新时代闽浙边合作发展先行区，为实现浙闽互联互通、合作发展贡献自身力量。4月23日，福安上白石、福安范坑、柘荣英山乡、泰顺龟湖镇签署新时代闽浙边合作发展框架协议。在打造闽浙边合作发展先行区战略性，泰顺与闽浙边相关县份合作的领域涉及司法、文旅、抗疫、金融、殡葬改革、警务、志愿、环境整治、文化遗产保护、质量监

督、宗教管理、交通、治安等。

#### 四、结语

闽浙边山水相连，道路相通，经贸交集，人文交融，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基于历史经验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新时代闽浙边合作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地情民情，符合边区各县份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作为闽浙边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泰顺，是合作的积极参与者、责任担当者、受益者。打造闽浙边合作先行区是助推泰顺绿色高质量发展、加快精彩蝶变的重要战略举措。

展望未来，边区各县份还应进一步积极探索打破行政壁垒的体制机制，持续拓展合作领域，逐步扩大成果。通过合作加快要素资源交流，根据各地条件，合理分工、优化发展。同时，突出合作重点领域：一是文旅领域。根据边区相似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力推动旅游业发展，让其成为实现合作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建立旅游合作互惠关系。例如，基于红军挺进师曾在闽浙边区转战的史实，共同开发旅游产品、创建品牌。二是交通领域。交通是制约边区各县发展的共同短板，可以携手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建立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实现区域人员、物资等畅通流动，提高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三是维稳领域。可建立与完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共创区域维稳合作机制。加快建立治安稳定形势联合预警、矛盾纠纷联合排查调处、治安乱点联合排查整治、治安问题联合巡逻防范、违法犯罪联合侦防打击、群体性事件联合预防处置等机制。

展望未来，闽浙边合作空间巨大、潜力无限、前景光明。我们衷心期待在合作下，各县份加快发展，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单位：泰顺中学）

#### 参考文献：

- 1.《激扬新时代温州人精神 在建设“重要窗口”中展现泰顺担当》：陈永光著，《温州日报》2020年6月2日，第2版。
- 2.《中国东南山区的地域社会结构：以明清浙江泰顺县为例》：吴松弟著，《历史地理》第2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3.《以农为主，还是多种经营：近代泰顺山区的商品经济》：吴松弟著，《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下转第40页）

# 浙南籍早期先进分子对地方建党的重要贡献

◇ 郑昌儒

浙南地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浙南籍一批先进分子通过创办进步社团报刊，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地方党团组织，为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创办进步社团报刊 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五四运动爆发后，温州市立十中、十师、艺文、甲商等校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王屏周被选为反日救国艺文学联会长，陈仲陶和游侠等10人在华盖山双忠祠创立救国演讲社，出版《救国演讲周刊》。陈式纯等参加十中流动宣传队，深入到平阳宜山等地进行反日爱国宣传。1919年暑假，温籍在外地的大专教师学生相继回乡度假，由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永嘉新学会”，创办

了《新学报》，并发表郑振铎的《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和态度》《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及略史》，介绍马克思和列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1923年，著名作家朱自清到温州市立第十中学任教，学生蔡雄、苏中常、金贯真、戴国鹏、陈卓如等在他指导下，成立“血波社”和“宏文社”，提倡新文化，开展反帝爱国宣传。同月，金贯真、李得钊等在永嘉楠溪成立“溪山学友会”和“青年策进会”，创办图书室，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 积极创建浙南地方党团组织

1924年8月下旬，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派温籍共产党员谢文锦到家乡宣传马列主义，筹建党团组织。谢文锦到温州后，通过访亲会友、召开座谈会、发表演讲等形式，在学生、工

人、农民中广泛宣传共产党纲领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颂扬苏联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美好生活。谢文锦首先介绍温州中一花席公司总技师郑恻尘、温州新民小学负责人兼任女子师范学校教师胡识因夫妇两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俩思想进步，在温州实业界、妇女界、教育界颇有声望。早期入党的还有林平海、庄竞秋、胡慧敏、戴树棠、孙道济等。经过认真筹备，当年12月，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简称“温独支”）在城区信河街侯衙巷新民小学成立，胡识因任书记。这是浙南地区最早建立的中共党组织，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谢文锦还介绍戴宝椿、金贯真、李得钊等8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温州支部，直属团中央，戴宝椿任书记。后戴国鹏和蔡雄任团支部书记。同年春，青年团杭州地委秘书宣侠父到台州海门（今椒江区）葭芷省立甲种水产学校发展党员，建立海门小组，并担任负责人。他介绍温岭籍金辅华、平阳籍章尚友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组建温岭独立支部，隶属宁波党组织领导。1925年6月，遂昌籍唐公宪担任“温独支”书记，他1921年参加中共领导的萧山衙前农民运动，1923

年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唐公宪奉命邀约遂昌籍中共党员谢云巢返回家乡发展党员。1927年1月，中共遂昌支部建立，隶属杭州地委领导。青田籍周定1926年在上海入党，同年返回家乡发展党员，1927年8月建立中共青田支部。后任省委特派员，赴温州实施浙东暴动计划时被捕牺牲。

1926年秋，“温独支”派瑞安籍党员林去病等到乐清县发展党员，后成立中共乐清支部，林去病任书记。同年11月，“温独支”又派林去病等到瑞安建立党小组，1927年2月，瑞安党小组改建为中共瑞安特别支部，林去病任书记。1925年，瑞安籍郑馨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中央八七会议后任浙江省委特派员。1928年1月，郑馨召集永嘉、瑞安、平阳3县党的骨干在瑞安城关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准备武装暴动。永嘉、瑞安、平阳三县先后建立了县委，郑馨、林去病、游侠分别任书记。郑馨后任浙西特委书记、省委秘书长、杭州市委书记、浙北总行委组织委员等职，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林去病任浙南特委常委，参与组织领导永嘉、瑞安、平阳三县农民暴动。曾担任宁波市

委书记，后被捕牺牲。1921年，平阳籍游侠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1925年在杭州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2月任中共平阳县委书记，领导平阳暴动失利后赴玉环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

1922年，平阳籍施味辛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受瞿秋白、邓中夏的影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等到青田籍华侨中宣讲马列主义，提高华侨的思想觉悟。在法国巴黎西比央古工业区和里昂车站做工的青田籍华侨张竹仙、陈育黄等7人，先后被吸收入党，建立两个海外中共小组。

### 选派进步青年留学苏俄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培训干部，选派了一批进步青年留学苏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党派遣去苏俄留学的浙南进步知识青年绝大部分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1年至1927年，永嘉的进步知识青年胡公冕、谢文锦、李得钊、金贯真、胡识因、金省真、金石

真、金演周、谢文侯、徐时惠、李立敬、郑育才和郑祚非，还有临海籍江秦龙、平阳籍蔡疾呼、黄胤等受党派遣先后到苏俄学习。永嘉县就有13名共产党员被党组织派遣到苏俄留学，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这批留学苏俄的进步知识青年不畏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境，奔向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真理。他们回国后，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谢文锦在五四运动期间来到上海，结识了瞿秋白等革命知识分子，并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社任职。1920年8月，谢文锦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任执行委员，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期入校的有刘少奇、任弼时、罗永农、肖劲光等。不久，王若飞、赵世炎、萧三等也到此校学习。1922年12月，谢文锦在该校转为共产党员。1923年冬，他担任共产国际代表、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同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随同到广州积极参与国共合作相关事宜。1924年冬至1925年春，谢文锦奉命回温州创建温州地方党团组织。1925年4月，《新青年》纪念列宁专刊登载他撰写的《列宁与农民》一文，此文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被选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谢文

锦历任中共上海区委执委、南京地委书记等职，1927年4月在南京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李得钊从苏俄学习回国后，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为莫斯科东方大学招生。1928年，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任编辑，在《红旗》《列宁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真理，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1930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成为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他任上海中央局秘书长，积极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工作，后在上海被捕，在狱中折磨致死。

金贯真于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不久被派赴国民革命军，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兼党团书记。1929年8月，留苏学习回国后，任浙南巡视员，赴仙居、黄岩、瑞安、平阳等地，深入农民调查研究。他还是红十三军的创始人之一。8月，周恩来在莫斯科接见留苏学生时说，浙江人民称金贯真是“浙江的金龙”。

金石真于1929年春留苏学习回国后，就去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四军某团参谋长，后在福建龙岩的一次

战斗中不幸牺牲。

## 招募革命青年赴黄埔军校 学习和工作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支持创办黄埔军校，中共浙江党组织推荐胡公冕等人到军校任教官，并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胡公冕，永嘉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体育教员，1921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2年，胡公冕作为我党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1923年9月，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次年出席广州国民党一大，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筹建黄埔军校，1924年秋，回到家乡招募一批进步青年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胡公冕历任黄埔军校学生大队大队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等职。在奉命返回温州招募学员期间，被军阀追捕，被迫提前离开温州，把招募任务交给刚建立的“温独支”执行。1924年秋至1926年间，“温独支”组织党团员深入城乡秘密招收学员150余名，分批乘

船经上海到达广州。从黄埔军校开办至1927年3月，黄埔军校前5期的浙江籍学员数量，青田、永嘉、缙云、温州等地都是名列前茅。胡公冕还从永嘉招募近千名青年到黄埔教导团，胡公冕担任该团的营党代表，这批青年后来成为两次东征和北伐的一支重要力量。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军委任命胡公冕为红十三军军长。青田籍学员麻植、缙云籍学员蔡鸿猷、龙泉籍学员季步高、李逸民，松阳籍学员吴玠、孟卿等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麻植曾参加东征后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负责人。蔡鸿猷曾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税警团上校党代表。季步高曾任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广州市委书记兼军委秘书，此三人被誉为“处州三杰”，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四·一五”惨案中，先后被捕壮烈牺牲。1925年，永嘉籍王屏周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担任驻宁波国民革命军卫生队长，回温后任永嘉县委书记，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平阳籍林珍赴黄埔军校学习回乡后参与领导农民运动和平阳暴动，后被捕牺牲。

## 组织发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

“温独支”成立后，平阳籍王国桢、张培农（张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浙南选派他们去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第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学习结束回到浙南，两人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农运特派员。张培农返回平阳后，深入发动农民，筹建农民协会，被推选为会长。在游侠、游馥等人协助下，全县农会组织发展到几十个，会员达几万人。组织农盐民进行“攻打盐堆”“平巢”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培农与叶廷鹏、吴信直等人组织农民武装攻打平阳县城。1925年，平阳籍游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配合张培农参与组织平阳农民运动和攻打县城战斗，后被浙南特委派往温岭县工作，曾任台州中心县委委员兼台州、黄岩团负责人，后被捕在宁波监狱牺牲。

王国桢回到浙南后，“温独支”派他到永嘉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和组织宣传工作，开展减租减息、抗捐抗税的斗争，被选任永嘉县农民协会主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和李振声、王金姆一起到永嘉进行革命活动，后转到瑞安和林去病、陈卓如

开展农运工作。协助中央巡视员金贯真组建红十三军和浙南特委。历任浙南特委书记、温州中心县委书记，后被捕在温州就义。

1924年12月，“温独支”成立后，党组织派党员在鹿城布厂工人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工人运动。雷高升（原名施德彰）是厂里的工运骨干，1926年被吸收为共青团员，后转为中共党员。在“温独支”领导下，雷高升向厂方提出“男女同工同酬，恢复减低的工资”的要求，遭到厂方拒绝后，他组织永嘉染织业工会，联络各纺织厂工人联合罢工，迫使资本家答应他们的要求。罢工运动胜利后，雷高升被推选为永嘉县总工会主席，随后各行业工会相继成立。瑞安县也建立了50多个工会，会员近万名。雷高升历任中共瑞安县委书记、红十三军红一团（师）长等职，后被国民党军队在温州诱捕杀害。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反共活动。1927年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召开会议，密谋以暴力手段实施“清党”。提出对全国各地共产党员应先“看管”的包括毛泽东等在内的197人的名单中，浙南籍共产党员有胡公冕、胡识因、唐公宪、郑

恻尘、林平海、金贯真、孙道济、庄竞秋、戴国鹏等12人。接着，反动派大肆逮捕、疯狂屠杀共产党员。4月11日，浙南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创始者，时任南京地委书记的谢文锦在南京被秘密杀害。同日，“温独支”主要领导成员郑恻尘为掩护其他同志在杭州被捕，后遭杀害。4月15日，陈仲雷、戴树棠、苏中常遭武装军警逮捕，被押解到杭州陆军监狱。5月18日，蔡雄在温州城区被捕，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后被秘密杀害。永嘉籍林平海是“温独支”主要成员，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等职，1927年7月牺牲。1926年，平阳籍陈式纯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后被捕牺牲于上海狱中。唐公宪遭通缉，在杭州被捕入狱。8月4日，张新锦撤离丽水时在金华被捕遇害。

浙南地区建党初期的历史，充分展现了浙南革命先烈和前辈不畏强暴，同仇敌忾，与反动势力作殊死斗争的献身精神；为实现崇高理想，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饮水思源，叶茂思根。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重温党史、领悟党史正当其时。我们要学习革命先烈和

革命前辈进行革命斗争的艰难历程和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从中受到启发和激励，从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好红色基因，让党的历史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者单位：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南分会）

#### 参考文献：

1.《中共温州党史（第一卷）》：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2.《温州近代史》：胡珠生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 （上接第33页）

版）2010年第2期。

4.《中国共产党泰顺历史》（第2卷）：中共泰顺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

5.《泰顺革命亲历记》：中共泰顺县委党史研究室编，1995年内部编印。

6.《红军挺进师在泰顺》：刘建

国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7.《泰顺历史三千年》：陶汉心著，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8年版。

8.《梅冷生集》：梅冷生著、潘国存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 《温州市教育志》评述

◇ 张声和

温州是浙江历史上办学最早的地区，同时也是教育大市。写好教育志，是修志者的重要使命。将要出版的《温州市教育志》，是温州二轮修志中大型的专业志，本志除了固有的教育事业的属性外，更具有时代的属性。

专业志的专业属性，是修志基石，也是修志者的工作指南。参加《温州市教育志》编纂者均为温州教育行家，他们长期从事温州教育的领导工作，是温州现代教育进程的见证者，是温州教育改革的执行者，也是温州高教园区等现代教育设施建设的领导者。主编潘龙俊与他的编纂团队，科学地运用了温州教育事业发展的史料，集资料性、存史性、著述性于一体，使《温州市教育志》成功地体现了温州教育的时代属性。

### 以资料系统性，体现时代属性

温州模式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

的时代属性反映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教育的发展当属最主要的领域之一。

### 一、以数据反映发展

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系统的资料，资料性是志书的最基本属性，它决定和影响志书的思想性、科学性、综合性和地方性。《温州市教育志》从启动开编始，就追求时代属性，并一条线贯穿到底，让资料的收集、整理、成稿都围绕着新时代温州教育的发展脉络，最终达到资料性和著述性的统一。

民办教育是温州的特色，民办教育发展的各种数据、演变进程，是体现温州教育不同于其它地区的时代属性之一：“2012年，全市有民办幼儿园1458所，在园幼儿29.6万人，占全市在园幼儿总数的89.1%、占全省民办在园幼儿总数的24.4%；民办小学26所，在校生6.3万人，占全市小学在校

生总数的10.5%，占全省民办在校生总数的16.2%；民办初中8所，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38所，初中在校生3万人，占全市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2.7%，占省民办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5.7%；民小高级中学39所、民完全中学4所、民办十二年一贯制学校5所，普通高中在校生4.6万人，占全市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32.4%，占全省民办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25.1%；民办职业高中30所，在校生2万人，占全市中职在校生总数的27.3%，占全省民办中职学校在校生总数的22.5%；民办普通高校5所，在校生25301人，占全市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3.1%，占全省民办高校在校生总数的8.4%；民办特殊学校2所，在校生351人，占全市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的13.8%；民办培训机构446所，在册学员9.3万人，占全市职业培训机构注册学员总数的23.7%。”这组民办教育数据，可以和全省各地进行对比，可以和本地区纵向的数据对比，科学地证明温州民办教育已经成为全市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以特色提炼资料

在科学地运用专业志书资料基础上，教育志编纂者将资料概括与提炼到位，以系统数据体现地方特色：

“1991年至2012年，温州市坚持科教

兴市、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借助市场经济发达、民间资本充裕的区域优势，深化办学体制和筹资体制改革，形成具有温州特色的“政府为主、大社会办大教育”的发展模式；用全省12%左右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撑起全省17%左右的全日制学生的教育，建成全省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和民办教育体系，建成较为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实现了基础教育普及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目标。”这段话，是点题之笔，观点寓于资料之中，达到资料性和著述性的统一。在大社会办大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温州教育志的资料收集，围绕着基础教育、民办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这几大体系，让整部志书有中心思想，有时代脉络，体现了温州教育在这20多年中的发展进程，展示出了时代性。

## 三、以阶段显示亮点

温州教育的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写好阶段性的发展，更能体现时代的进步。为了在志书里体现国家鼓励发展民办教育方针，在“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框架下，入志资料集中反映了

民办教育“恢复、兴起、突破”3个阶段。撰写上又在民办教育的“投资办学、合法合理回报、实行分类管理、适应多元需求”4个方面展开，较规范地记述了民办教育温州发展模式。这种时代特性贯穿于教育志的各个章节，充分展示了温州模式在温州教育事业中的亮点。

教育志的专业性是表现时代属性基础。此志的编纂者长期从事教育行政工作，不仅掌握教育各阶段发展的脉络，又能以最有力的科学资料和数据来为其验证，充分展示其时代属性，这当属《温州市教育志》的最大优势了。

《温州市教育志》善于运用表格来表示阶段发展的变化，用学校数、学生数、师资数、投入数等的表格来反映阶段成果。

作为《温州市志（1991—2012）》的总纂人，我曾称教育志是《温州市志》各部门志中，资料运用最为恰当、逻辑性最强的志书。也是众多专业志中为数不多的能透析出时代属性的志书。

### 以培养有用人才，突出教育创新

《温州市教育志》贵在能真实地

把温州教育在20多年中的发展成就和盘托出，在表现教育事业地方性与时代性时，让志书的体例在合乎专业志要求前提下，不守旧，不嗜奇，既平衡“地方性”与“时代性”，又尽力书写有实质性成效的教育发展成果，使温州模式在教育事业上得以伸展。

教育的天职是培养人才，温州在开放中突破了人才培养的传统做法，在创新上做文章，在培养有用的人才上做文章。《温州市教育志》记载了高校培养人才的7种办学模式，这在全国教育史志上都很少见。除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大学的创新性的人才培养模式之外，志书还列举了温州职业教育的模式。

#### 一、校企合作办学共赢模式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校企合作办学共赢模式”：学院先后创办了温州服装学院、中国鞋都技术学院、温州轻工学院、温州家具学院、温州酒店管理学院5个校企深度合作的二级学院，建立了国家示范性数控技术实训基地、浙江省高职高专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温州市先进制造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示范基地、温州市材料成型工艺与模具技术重点实验室4个校企深度合作的实验实训基地，建立了浙

江省木材加工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温州家具研发中心、温州市服装行业科技服务创新平台、浙江省温州轻工机械技术创新服务平台3个产学研深度结合的创新平台，成为浙江省校企合作的创新平台，成为浙江省校企合作的研究基地。

## 二、园区化的工学模式

浙江经贸学院的“园区化的工学模式”：学院与温州报业集团共建浙江创意园，有23家文化创意机构入驻，聚集了广告设计、工艺设计、建筑设计、展示空间设计、动漫创作综合网站等文化产业优质资源，为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搭建了“连体式”产教一体教学平台。创意园区于2012年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特色工业设计示范基地，被温州市认定为市级文化产业园区，入驻企业增加到26家，总产值超9000万元，税收超800万元，入选浙江省首批重点文化产业园。

## 三、行业主导校企对接模式

东方学院的“行业主导校企对接模式”：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先后归口浙江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现代服务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学院与全市110多家企事业单位签订了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协议，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让学生在课外也能以“职业人”的身份参加与所学专业相关联的实际工作。

## 四、农科教一体化模式

温州农科院“农科教一体化模式”：学校先后与鹿城区、龙湾区、瑞安市、苍南县、永嘉县、文成县签订“院地科技合作协议”，先后分4批次选派科技特派员深入各乡（镇）、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开展示范基地建设、成果推广、技术服务、农民培训等工作；组织和参加科技下乡活动、举办培训班等，每年受益农民10万余人次。学校服务全国、全省、全市，培训乡镇干部、农村干部、大学生“村官”、农业专技人员、合作社组织负责人、种养大户、退役士兵、碳汇技术人员、渔业职务船员、普通农民等各类人员18370人次。

以上撷取的《温州市教育志》中关于培养有用人才的片段，是温州教育与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合拍的创新模式。编纂者突破了传统的教育志写法，跟随时代的发展去捕捉、记述鲜活资料。这些办学模式，看似与教育并无关联，但这些亦工、亦农、亦商的教育实践，是鲜活的教育创新做法，深刻地反映温州

教育的时代属性。

### 以教育投入变化，记述时代进程

笔者在二轮修志过程中，对所属部门提供史料工作曾作如下要求，“以事件反映发展，以数字反映变化，以事系人反映时代风貌”。简单地说，入志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事件、数字、人物”。编纂教育志，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能最直观地反映温州教育变化和时代进程，是教育事业在历史发展上最有力的见证。它反映了地方经济实力，反映了地方党政部门对于教育发展的重视，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的相适应程度。《温州市教育志》经过编纂者的精心收集与筛选，各种数据反映出了这个时代的发展，阶段性的数据变化起到时代进程晴雨表的作用，可资可鉴。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过去的20多年里，教育投入以几十倍的速度发展：1991年至2012年，全市教育经费总收入从3.35亿元增加到175.32亿元，年均递增20.7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3.61%上升到4.78%。其中，各级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从2.37亿元增加到125.58亿元，年均递增

20.81%，高于财政总收入年均递增率0.10个百分点，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23.84%上升到24.25%。22年全市教育总投入1247.59亿元，在全省占比为12.95%。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766.91亿元，在全省占比为12.12%；以学杂费为主的事业性收入257.65亿元，在全省占比为11.98%；以社会与个人的捐资、集资和办学投入为主的其他教育经费223.03亿元，在全省占比为19.30%。

从全市教育部门的教育经费总支出可以看到，教师待遇20年中快速增加：从1991年的3.1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23.64亿元，年均递增19.02%。其中，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和绩效工资、社会保障缴费、代课人员工资、离退休费、医疗费、助学金及其他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从1991年的1.41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79.95亿元，年均递增21.2%。

从教育公用经费支出可以看到基础设施的较大改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维护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福利费、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交通工具购置、信息网络购建及其他用于公用的支出）从1991年的0.88亿元增加到2012年22.71

亿元，年均递增16.74%；校舍新建和维修等支出，从0.90亿元增加到20.98亿元，年均递增16.18%。

温州市各类公办学校中，市属普通高校发展最快，在教育支出中显示了温州高校的发展速度：市属普通高校从1991年的0.11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0.33亿元，年均递增24.15%；成人高校从1991年的0.01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0.88亿元，年均递增23.76%。

《温州市教育志》于2012年启动，与《温州市志》同步编修。我对

《温州市教育志》的整个编纂是关注的，参与试写稿定调、初审、复审和终审的全过程。我认为，“严谨、全面、特色”构成了《温州市教育志》的特点，时代属性是它最大的亮点。这部专业志立足温州改革开放，把握地方教育发展维度，聚集温州教育事业创新，为后人留下一部可资可鉴的地方史料。

（作者系《温州市志》主编）

---

#### （上接第70页）

南艰苦奋斗的全体同志致以亲切慰问。”这一指示，表达了华东局和浙江省委对浙南党组织的高度评价，也再一次肯定了浙南游击根据地这一战略支点的重大作用。

#### 四、结语

浙南游击根据地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由中央红军主力和浙南地方革命力量共同开辟创建的一个革命根据地，随后又历经八年抗战烽火和四年解放硝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包围、反复“清剿”和日本侵略者的骚

扰掠夺、狂轰滥炸下艰难发展。从1935年红军挺进师入浙，一直到1949年浙南全境解放，“浙南十四年红旗不倒”，其意义和作用绝不局限于浙南这一个特定的空间，它有着更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正如粟裕同志在总结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所述：浙南这个战略支撑点是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粟裕军事战略 战术的丰富和发展

◇ 林依俐

1935年春，由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简称“挺进师”）由江西进入浙江，由此拉开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3月21日，挺进师在福建寿宁的上村遭到福建保安第二团的袭击，通讯器材丢失，挺进师与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之后的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粟裕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这段经历，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粟裕的军事战略战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适时实现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

粟裕既没有上过军校，也没有专门学习过革命战争的理论。他的学习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粟裕在《粟裕战争回忆录》中提到：“南昌起义后向广

东进军，沿途同蒋介石的军队打的是正规战，两军对阵，正面交锋，把敌人打垮了，仗就打胜了。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粤、闽、湘、赣，部队只有几百人了，不能再按老办法打仗了。当我们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崇义县西边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后，朱德、陈毅同志决定把部队带上山，开展游击战争。……于是从搞正规战转变为打游击战的思想，就这样在同敌人战斗的实践中产生出来了。”这段经历给粟裕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懂得了适时转变战略的重要性。

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开始将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起来。粟裕回忆说：

“井冈山时期的战争形式，初期以游击战为主，也有运动战；后期则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当然，那时的运动战还是初级的，或者说是游击性的运动战。”在实战中，粟裕积累了

一些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经验。在跟随毛泽东、朱德参加战斗的过程中，他逐渐明白，战争有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

1935年初，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严重受挫的背景下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也从反面证明了适时转变军事战略的重要性。当时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加紧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形势日益严重，但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没有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反而把擅长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同擅长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红十军团，集中在一起打运动战，这导致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的失败。究其原因就是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怀玉山突围后，粟裕曾反思失败的教训，并认为“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教训，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我们相信是可以浙江立脚生根……”挺进师进入浙江后，国民党纠集大量兵力进行“围剿”，而挺进师只有500余人，与国民党的重兵相比，挺进师只是一

支游击队，正常情况下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敌强我弱，形势严峻。从挺进师的实力与险恶的环境出发，粟裕提出要实行游击战战术。

3月中旬，为加强领导，适应游击战争，挺进师建立了师政治委员会（简称“师政委会”）。同时，为增强部队独立作战能力，师政委会对原来战斗部队的编制和干部配备重新作了调整，将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每个纵队下设2个支队，每个纵队设立行动委员会，作为单独行动时的集体领导组织。师部机关工作人员编为政治连。3月30日，挺进师在庆元半岭村召开师政委会会议。会议主要精神是：继续统一干部的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克服少数同志怕到浙江打游击的观念。同时考虑到游击战争的特点，有时要分散，有时要集中，但分散出去的部队又必须是既能独立行动，又能互相配合的。师政委会要求把会议精神传导到各个连队，直到每个战士。作好部署安排后，挺进师转入福建政和、寿宁等县，开始在浙闽边境开展游击战争，为进入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准备。

4月28日，挺进师在庆元斋郎地区以少胜多，击溃了超过挺进师6倍之众的浙、闽两省保安团，以及“大

刀会”等地主武装共3200余人的联合进攻，迫使敌保安团队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转为退守，一些地方反动势力离开浙西南，挺进师获得了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5月初，挺进师再次召开师政委会会议。会议认为，要抓住斋郎战斗胜利和敌人兵力暂时空虚的大好时机，挺进师在进入浙西南以后，要尽快实现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会议决定散布第一、第二纵队及政治部工作人员到松阳、龙泉、遂昌等县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党组织和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开辟根据地；粟裕、刘英率其余各部转战到外线，大幅度地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扩大共产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迫近浙赣铁路，威胁杭州、金华、丽水等中心城市，吸引国民党武装主力北调，掩护第一、第二纵队开展地方工作。这是斋郎战斗以后，挺进师分纵队各自独立行动的开始，为实行正规军向游击队、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迈出了第一步。

挺进师是以长于正规战的原红军部队为基础组建的，不善于打游击战。其成员大都来自湘、赣、闽等省，进入浙江后，人地生疏，言语不通。因此，开始时不少干部战士对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存在畏难情绪。为

此，挺进师政委会先后采取了各种措施，如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部队的编制和干部配备进行调整，使之适应游击战的特点和需要。同时，为培养部队游击作战的能力，粟裕将部队分成若干个小部队，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让团级干部独立带领小部队分散活动，并将活动时间从3天增至5天，之后再逐步延长。最后，排长、班长都能带领小部队进行单独活动，部队独立作战能力和游击作战能力都得到显著提升。

1938年1月，为给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员讲授游击战术，粟裕结合自己多年游击战的经验和思考，专门撰写了《游击战术讲授提纲》。文中深刻论述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他写道：“抗战以来的事实证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正规军在正面进行的正规战争是很不够的，必须同时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深入沦陷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可以有效地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争取战争的胜利，以保卫国土和民族。游击队在敌后作战，可以更好地避敌之长，攻敌之短，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长期消磨敌人。游击队在敌后，可以担负武装宣传队的任务，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动

员与团聚广大群众为国效劳，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游击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光复国土，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积蓄力量。”这正是粟裕根据形势转变军事战略，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经验总结。他也由此将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地位，充分彰显了他深远的战略眼光。

## 二、创造性运用与完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

在跟随毛泽东、朱德东征西战的过程中，粟裕学习到了诸多宝贵的经验。他后来回忆道：“湖南起义后，许克祥带5个团的人马来进攻我们，朱德同志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打法，部队撤出宜章城，隐蔽集结于有利之地域，第二天同许克祥打了一个预期的遭遇战。此仗，我们运用新的战法，以一个团打败敌许克祥5个团，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由此，他深受启发。在连续征战过程中，粟裕逐步领会了追击、迂回等战术的重要性，并在他领导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

字诀。这十六字诀成了粟裕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基础。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粟裕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这十六字诀，提出了一整套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其中最具创新性的就是提出了“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

挺进师挺进浙西南，成功建立游击根据地，无异于在国民党后院燃起了一把火。1935年8月，国民党调集七八万兵力对挺进师进行“清剿”。探知敌情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回顾分析中央主力红军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后，粟裕指出，“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退（进）’的方针”。也就是说，敌人进攻我方根据地，我方则避免与敌正面冲突，进击敌人后方，调动敌人，打击敌人。最后，挺进师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第十五支队就地坚持，主力部队迅速跳出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敌人得知挺进师主力已跳出包围圈，突围进入浙闽边境后，深知以数万大军“追剿”分散活动的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于“拳头打跳蚤”。因此，除派出一个师约5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部队外，仍将几十个团的主要

兵力集中在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面对敌人不受调动、集中兵力摧毁浙西南根据地的策略，挺进师迅速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即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游击根据地。这是粟裕第一次明确提出“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这也是他军事思想中的独特创新。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采取“南剿北抚”的政策，加紧“围剿”共产党在南方的游击根据地。在浙南，敌人调集43个团10余万兵力，对浙南游击根据地展开新一轮的“清剿”。国民党军采取拉网式推进战术，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企图把挺进师逼向东南一隅，然后在飞云江以南、沙埕港以北的沿海地区聚而歼之。针对敌人的“大拉网”战术，粟裕深入总结之前的成功经验，再一次采取了“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挺进师“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敌人梳过来，我军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同时根据敌情，部队有合有分，实行灵活机动。这一时期，挺进师将“你进我进”的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由此，在毛泽东“十六字诀”

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三年游击战争经验，1938年，粟裕把游击战术在浙南游击区的运用，归纳为六条原则：一是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二是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三是支配敌人，掌握主动；四是积极进攻，绝少防御；五是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六是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在作战、行军、宿留等等方面，他也总结出了几条要领：一是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二是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三是站在敌人侧翼、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四是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五是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他们总结了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许多方式，做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使敌人无法捉摸。行军沿途的痕迹也留专人殿后负责清除，有时则在与行动相反的方向弄出痕迹，迷惑敌人。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粟裕根据实际情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完善了自己的军事战略战术。在

他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指导下，挺进师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开辟了大量革命根据地，保留与发展了革命有生力量，锻炼和考验了干部，让浙南的革命红旗始终屹立不倒。

### 三、充分重视建设与发展游击根据地

粟裕根据地思想的确立是在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处在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井冈山时期，粟裕学会了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方法。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他要求每个干部、战士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同时，他在实践中深刻理解“打仗是为了建设根据地，建设根据地又是为打更大的胜仗创造条件”。因此，建设游击根据地也成为粟裕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极为重视的工作之一。

在开辟建设浙南游击根据地时，为更好开展工作，粟裕和刘英将挺进师分成“突击队”与“牵制队”，将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突击队”即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守在基本地区，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牵制队”则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

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并发展新的游击区。刘英率“突击队”与省委机关坚守浙南地区，粟裕则带“牵制队”在广泛的地域公开打游击。

在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粟裕考虑到，为长期坚守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周围，还需要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使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在粟裕的思想中，根据地不是单独的、孤立的，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的。粟裕认为，一个个游击基点逐步向外发展，可以联结成小块根据地；小块根据地再加上外围的游击基点，可以形成大块根据地。对根据地不断进行巩固和加强，它们就能成为挺进师背后的有力支撑。粟裕根据自己的根据地建设思路，建立了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游击基点，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他在一些重要地区，选择条件较好的村庄开始工作。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成了一个游击基点，离

开十几公里，再建立一个新的游击基点，这样逐步向外扩展。基点密集的，联系起来就成了一小块游击根据地。在小块游击根据地外围，还有分散的游击基点。

浙南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挺进师进入浙南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取得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后，挺进师和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开始着手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1935年12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将鼎平中心县委所属的鼎泰区划出，与泰东游击根据地的泰平区组成瑞平泰县委，次年1月，瑞平泰县委被划为省委直属区。这是挺进师进入浙南之后的第一块根据地。在此期间，挺进师攻占瑞安珊溪镇（今属文成县），游击于福鼎、瑞安、平阳、泰顺之间，先后攻克了景宁、瑞安、平阳、泰顺、青田等县许多集镇和敌人据点，并把游击战争发展到瓯江下游两岸以及飞云江和鳌江之间的大部分地区。1936年夏，以泰顺、平阳、瑞安、福鼎等县边界为中心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初步形成。两广事变爆发后，利用敌情缓和之机，在“牵制队”的掩护和策应下，粟裕率队集中力量打通了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各基本地区达成

一片。然后又调集一批力量，发展新区，扩大了根据地范围。

在拓展根据地的同时，粟裕还在这些根据地内积极开展工作，对根据地进行巩固和发展，他通过政策的威力，联系群众，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同时，在敌人势力强大和敌我拉锯的地区，还建立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起到了分化和瓦解敌人的作用。与此同时，粟裕也非常重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部队活动的地区大多是林木茂密的山区，他们通过支持竹木和山货出口，鼓励平原城镇的客商进山，使商品得以流通，山区经济得到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改善。同时，也争取了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使得部分军需品能得到及时的供给。这些政策，在粉碎敌人的封锁和反“围剿”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1936年底，红军挺进师发展到1500余人的规模，还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游击战争的范围到达闽浙边界两侧，浙江南部金（华）衢（州）盆地以及台州部分地区，共计30多个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包括瑞安（含今文成）、平阳（含今苍南）、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霞浦、寿宁、庆

元、永嘉等县的大部或部分地区。在浙南特委领导下，县委由3个发展到6个，即瑞平泰中心县委和鼎平、福鼎、泰顺、桐霞、平阳县委，党员有3000多人，地方工作干部有500多人。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人数达10万之众。至此，红军挺进师拥有了浙南这块牢固的游击根据地，还有浙东、浙西南小块游击根据地和大量分散的游击基点，互相支持，互相掩护，给予挺进师十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 四、注重把武装斗争同群众工作有机结合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时期，粟裕深刻领悟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率领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之前，粟裕就认真分析了浙江的形势，知道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是有革命传统的，认为这对于挺进师来说是有利的。在认真分析浙江的地理位置与地形后，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其中一个理由就是：“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该地区在1930年曾受到过党所领导的红十三军革命暴动的影响，革命的火种还在一些基本群众的心底埋藏着。那里有一个

青帮组织，其领导人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抗已久，有打富济贫的要求，同我们有一点联系，可以成为我们初步的依托。”

红军挺进师挺进浙西南后，就与当地的青帮组织领导人陈凤生、卢子敬等取得联系。陈、卢等人主动迎接，积极响应，高呼“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的口号，表明对挺进师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随后，挺进师对青帮进行了整合与改造，吸收成分好的青帮成员加入贫农团、雇农工会和手工业工会等群众组织。经过教育，青帮内一些觉悟高的成员还加入了党组织，壮大了革命队伍的有生力量。在挺进师的领导下，青帮成为了开辟、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在泰顺和景宁以西，龙泉河以南和闽浙交界一带，活跃着封建迷信组织“大刀会”。为消灭挺进师，国民党利用地理位置封闭、农民群众思想落后等特点，利用“大刀会”对挺进师进行丑化宣传，“大刀会”成为了国民党对付挺进师的工具之一。因此，挺进师刚进入浙西南境内的庆元、龙泉等地时，当地老百姓见了挺进师不是躲就是逃，极大增加了挺进师开展工作的难度。为充分瓦

解“大刀会”，挺进师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以政治宣传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一方面，因其是一个反动的武装组织，必须用军事力量摧毁；另一方面，由于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大多数是被欺骗的贫苦农民，挺进师着重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宣传，以争取会徒及其家属的信任与拥护。如“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争取了当地‘大刀会’中的大部分群众。当‘大刀会’法师向会徒们吹牛说自己‘刀枪不能入，子弹打不进’时，群众根据我们的布置，要他自己先做示范。他不得不让会徒向他打枪，只是站远一点，想侥幸过关。结果群众一土枪就把他打死”。挺进师便抓住机会，利用鲜活的事实，揭穿“大刀会”头目的欺骗行为，并趁机教育群众，指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打倒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反动派，农民才有出路；红军是工农武装，不打工人、农民与穷人，借此打破了会徒们的迷信心理，也改变了农民对挺进师的认识。在挺进师的双重策略攻势下，“大刀会”最终被成功瓦解。

在团结青帮、瓦解“大刀会”的同时，粟裕率领挺进师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

挥了政策的威力。为了解当地风俗习惯、地理位置等情况，更好地开展游击战，粟裕率领部队积极做好群众工作。他们认真学习浙南当地方言，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和发动群众。在领导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中，挺进师始终重视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他们坚决贯彻土地革命的纲领，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和分青苗、分土地的斗争。1936年8月下旬，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下辖瑞平泰、鼎平、福鼎、桐霞、泰顺和平阳6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和16个区人民革命委员会。各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积极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群众基础比较扎实的鼎平、福鼎、瑞平泰和桐霞4县，应群众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普遍进行以分青苗为主的土地革命。在平阳、泰顺2县则广泛开展“四抗”斗争。这些斗争，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

在浙南游击根据地，挺进师和闽浙边临时省委还普遍建立党、团组织和贫民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注重发展山区经济；团结争取知识分子，

尽最大可能团结和发动群众，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游击根据地。

### 五、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

粟裕曾说：“打仗是最讲辩证法的，因为双方都是活生生的人在行动，敌人同我们一样也会动脑筋走路，他打着打着就变了招，我们就得跟着变招，我们也常要根据战场上变化了的形势来变化打法。孙子说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始终贯穿于粟裕的戎马生涯。在总结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教训时，粟裕就反复批判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绝对集中主义。他认为，战场上的形势千变万化，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灵活地执行政策，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进入浙江前，粟裕、刘英就针对浙江的军事、政治、地理、地形等情况作了认真的研究和详细的分析，为进入浙江作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撑。进入浙江后，根据形势变化，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粟裕作出了第一个转变，即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作战中，粟裕很重视“知己知

彼”。他要求行军前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依据敌情和实际情况，审慎地决定自己的行动以及方向、行程、目的地等。自己活动区域要有详细的地图，否则应作精细的地形、路线调查。部队每到一地，需要每天认真调查地形道路，详细到每一条岔路的不同走向。这样即使在路上遭遇敌人，也能有万全的准备。此外，粟裕还经常收集敌占区报纸，作详细的分析与判断。有时采取偷听敌人通话或者突袭的方式，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和活动情况，掌握最准确和权威的敌军军事情报，以便更具针对性地调整对策策略，部署作战。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粟裕从不拘泥于教条，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他总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政策，发挥政策威力。在吸取浙西南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挺进师改变斗争策略，组成“突击队”与“牵制队”，分别进行活动。在“突击队”与“牵制队”的紧密配合下，浙南游击根据地建设蓬勃展开。

在积极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同时，挺进师对浙西南根据地丢失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及时对建设浙南根据地的政策进行调整。1935年挺进师

进入浙西南仙霞岭地区，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时，沿用了中央苏区的做法，没有考虑浙江斗争的实际形势，没有注意将公开斗争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刘英在《北上抗日与坚持三年斗争的回忆》中写道：“对策略路线的运用，在执行上犯了某些不可忽视的错误。如将秘密工作转为公开，秘密的赤色农会公开的打土豪，对保甲长某些地区认为都是反革命……”在开辟浙南根据地时，他们吸取了浙西南斗争的经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其主要内容是：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改变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把“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改为“征收抗日捐”；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严厉惩治改为尽可能予以争取；对地方上士绅和中等商人的进步表示欢迎，中立的也允许自由来去，其营业不受侵犯；对国民党军政策由“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同红军一起共同抗日”；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时，他们依据浙江的经济发展特点，重视团结工商

业者，让平原城镇的客商进山做买卖，发展山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这些政策的调整，为红军挺进师的发展与游击根据地的扩大，为统一战线的建立，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闽浙边临时省委以高度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预感到中央政策的转变，及时调整策略，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顺利实现由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是粟裕第一次独立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率领挺进师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由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两次战略转变。在浙南这块红色热土上，他领导人民群众和武装力量不畏艰险，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浙南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浙南三年的游击战争与根据地建设经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粟裕的军事战略思想，充分彰显了他作为一名优秀军事指挥员的才能和远见卓识，成为他军事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作者单位：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 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支点作用探微

◇ 王志愿

浙南，是一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浙南地方组织和人民武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谱写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从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组建，浙南大地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红军挺进师进入浙南后，会合浙南革命力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并使其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在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 一、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与创建

浙南，革命之火经久不息，红色热潮历久不退。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浙南人民便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1924年12月，浙南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

成立，领导广大民众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浙南农民武装暴动风起云涌，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斗争。红十三军主力斗争失败后，其余部及地方游击队伍仍然坚持战斗。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继续坚持斗争。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在浙赣皖交界的江西怀玉山地区遭遇重创，其先头部队突出重围。中共苏区中央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指示电，责成闽浙赣省委立即以先头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长期行动。中央赋予挺进师的任务是：“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

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临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红军挺进师奉命组建后，克服艰难险阻、越过重重封锁，辗转闽浙边境，孤军深入浙江，汇合当地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斗争策略，坚持开展三年游击战争，开辟创建了浙南游击区，并最终在浙南地区扎稳了脚跟。

浙南游击区，东濒东海，南连闽东，西与赣东、闽北接壤，北至杭（州）江（山）铁路（今浙赣线）以南，其核心区始为浙西南地区，后转移到浙南地区，系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国革命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之一。其开辟与创建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 （一）孤军入浙，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1935年2月，在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南方各游击区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进攻的艰难时刻，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受命组建，并临危不惧。以原抗日先遣队先头部队为基础，加上闽浙赣军区红三十师第一团100余人，共538人，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3月25日，红军挺进师越过

闽浙边境，进入龙泉宝溪乡境内，在溪头村与国民党保安部队打响挺进师入浙第一仗，拉开了红军挺进师入浙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序幕。4月下旬，挺进师转战至庆元斋郎地区，击溃并瓦解了近千人的地主武装“大刀会”，痛击1200余人的浙江保安第一团，毙伤敌300余人，俘敌近200人，取得了斋郎战斗的胜利。斋郎战斗后，挺进师主力乘胜追击，迅速挺进浙西南腹地，进行根据地开辟工作。5月上旬，在云和县境召开师政委会，决定从正规战转为游击战，并决定创建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6月上旬，在松阳县小吉村召开师政委会，决定成立浙西南军分区和中共浙西南特委。7月，挺进师师部进驻遂昌县王村口，领导浙西南军民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8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在遂昌、龙泉、松阳、江山、蒲城5县间形成，纵横百余公里。游击区域范围持续扩大，北抵杭江铁路，南至浙闽边境北段，西及闽赣边境，东到丽水、宣平等地区。

#### （二）两反“清剿”，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如同在国民党后院燃起一把火，而其发展之迅速更是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高度紧

张。8月1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紧急任命卫立煌和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为“闽浙赣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的正、副指挥，其随后制订的《第一期清剿红军计划》明确提出“以各边区的大部对粟、刘”。9月19日始，国民党军32个团连同地主武装共40个团约七八万兵力部署甫定即向浙西南大举进攻、猛烈“清剿”。红军挺进师得知敌情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的第十五支队以及地方工作团，协同地方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其余部队迅速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红军挺进师主力跳出敌包围圈后，第一纵队转向浙东行动，刘英、粟裕率第三、第四纵队及师直属队挺进浙南，以灵活机动的作战行动吸引和调动国民党军，同时大力开辟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10月5日，刘英、粟裕率红军挺进师主力转战至福建省寿宁县郑家坑村，与闽东特委书记叶飞领导的闽东独立师一部会师。双方召开联席会议，商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机构，协同对敌斗争。11月7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泰顺县白柯湾成立，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下辖浙西南、闽东两个特委。同

时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为司令员，刘英为政委。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挺进师在闽浙边立足后，以闽浙边为依托，逐步向北发展，着手开辟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挺进师主力在浙南广大地区主动出击，一举攻占瑞安珊溪镇（今属文成县），随后又先后攻克了景宁、瑞安、平阳、泰顺、青田等县许多集镇和敌人据点，一直打到瓯江南岸，直抵东海之滨。闽浙边临时省委则在闽浙边的泰顺、福鼎、平阳、庆元、寿宁、松溪间行动，充分发动群众，开始建立浙南游击根据地。1936年3月，临时省委决定，闽东特委在福鼎、鼎平、泰顺等地建立的党组织及其所辖地区，与挺进师在浙南所发展的党组织及新开辟地区统一划为浙南特别区，并宣布成立中共浙南特委，郑宗毓任特委书记，统一领导浙南地区的斗争。特委下辖福鼎县委、鼎平县委和瑞平泰县委。6月，临时省委和浙南特委撤销瑞平泰县委，建立瑞平泰中心县委。撤销鼎平县委，建立鼎平中心县委。同时建立桐霞县委、泰顺县委和平阳县委。是年夏，以泰顺、平阳、瑞安、福鼎等县边界为中心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基本形成。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将对付挺进师的第十八军和驻闽东

的第九师调往湖南及闽粤边。挺进师紧紧抓住敌情缓和的有利时机，在浙南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加强根据地建设。刘英带领临时省委机关和武装工作队坚持在浙南地区，秘密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首先，集中力量打通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各基本地区连成一片，其次，调集一批力量，向新地区进发，扩大根据地范围。在此前后，挺进师与叶廷鹏领导的一支浙南革命队伍会合，其力量由此到达平阳北港和飞云江中游南北两岸的平原地区。至1936年底，游击战争的范围到达闽浙边界两侧，浙江南部金（华）衢（州）盆地以及台州部分地区，共计30多个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包括瑞安（含今文成）、平阳（含今苍南）、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霞浦、寿宁、庆元、永嘉等县的大部或部分地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民党采取“北抚南剿”的方针，刘建绪第四路军和各地地方保安团等约10万兵力，对以浙南为重点的闽浙赣皖四省边区进行了残酷“清剿”。1937年1月15日，刘建绪开始向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根据地发起进攻。2月5日，国民党军第八十师1个团和浙保第三、

四团约3000人进犯泰顺峰文。刘英、粟裕率红军挺进师主力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于简垟大峡伏击国民党军，歼敌数百。随后与敌激战三天，分路转移后安全撤离。峰文战斗后，刘建绪令第十九师、独立第九旅和浙江保安第二、三、四团与驻守福建福鼎的第八十师相配合，企图将挺进师围歼于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之间。面对国民党大规模“清剿”的严峻形势，临时省委在泰顺牛童召召开会议，研究确定了“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结合的反“清剿”方针，决定让部队“化整为零”，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以便游击行动。除留下少数兵力配合地方干部在浙南根据地内坚持斗争外，刘英率领省委机关和特务队到永（嘉）瑞（安）平（阳）泰（顺）边区活动，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回浙西南地区活动。3月25日，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的精神，发布快邮代电，呼吁国民党浙江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议双方派员进行和平谈判。

浙江国共两党第一次和谈最终宣告破裂，国民党军继续大举进攻，欲彻底消灭挺进师。在此次反“清剿”斗争中，挺进师吸取经验教训，运用

游击战术，灵活应对、沉着应战。当敌方展开“大拉网”式“清剿”，挺进师与敌相向对进、易地而战、以逸待劳、避实击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同时进一步分散作战单位，由最初的百余人集中行动分散到几十人一队、十几人一队甚至几个人一组，以组为战、以人为战，必要时再行集中，聚歼分散之敌。国民党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不得不沮丧道：“以数万之众，剿千百之匪，数月于兹，未奏肤功。”在长达8个月的反“清剿”中，红军挺进师由1500多人减少到300多人，但红军挺进师凭借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最终坚持了下来。“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所遭受的摧残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浙南这个战略支点，坚如磐石”。

### （三）国共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次日，闽浙边临时省委审时度势，发出通电宣言，再次敦促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在“国难已到生死存亡最后关头，应无条件的首先停止内战”。刘建绪迫于形势，表示愿同红军重开和谈。8月24日，临时省委派吴毓、陈铁君、黄

耕夫为代表前往温州城区申江旅馆，会见刘建绪的代表邓劭，重启和谈。谈判中，临时省委代表阐明了和平合作、团结抗日的立场，在坚持共产党独立、批评自由以及保持红军武装独立性的前提下作了适当让步，国民党方面也不再坚持原先苛刻的条件。经过几次协商，双方和谈成功，初步达成五项协议。谈判结束后，临时省军区当即发布《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布告》，要求所属部队迅速向军区所在地集中，以期早日实现对日作战。同时，临时省委和闽浙军区发布《为巩固和平、坚决抗敌告全国各界男女同胞书》，表明浙南红军游击队与全国军民团结御侮的态度和决心。9月16日，刘建绪派员到平阳山门，再次就双方合作事项展开讨论，刘英亲自参加会谈。17日，双方最终达成七项协议。此次国共双方在温和谈成功，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正式实现，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根据双方的和谈协定，分散在浙南、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部队于1937年10月陆续汇集平阳北港，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到浙南传达中共中央长

江局和东南分局关于闽浙边红军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浙江临时省委的决定。根据中央“一定要保存”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要求，刘英留在浙江坚持斗争。3月18日，粟裕率红军挺进师主力400余人从平阳山门出发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三营。至此，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红军挺进师从1935年3月入浙至1938年3月开赴皖南，历时整整三年，完成了两次战略转变，经受了两次大规模“清剿”，在浙南立稳了脚跟，开辟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并使其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

## 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大历史作用

红军挺进师入浙三年，高举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旗帜，以五百精锐之师，发动几十万工农群众，沿着艰辛、惊险、曲折的革命历程，开辟了浙南游击区，创建了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打开了浙江南部地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在战略上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的军事行动，支援和掩护了邻近游击区的革命斗争，发展和

壮大了浙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光荣使命，实现了中央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战略目标，使浙南游击战争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 （一）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等南方8个省15个地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作为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之一，其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革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在战略上互相策应、战术上互相配合，形成了土地革命后期中国革命战争的两大战场。

红军挺进师奉命组建入浙之时，闽浙赣苏区正处于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而浙江更是国民党统治最为严密的地区，反动势力盘根错节，革命形势错综复杂，共产党的组织系统也屡次遭到破坏。在当时革命基础比较薄弱，同时面临十分险恶的社会环境，且在与中央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仅538人的红军挺进

师，仍毅然孤军深入浙江开展革命。在深入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地带后，挺进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令国民党反动派大为不安。国民党浙江当局《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其进展程度，比江西还要厉害”“隐忧堪虞，较之民国十九年之匪祸，当有过之而不及”。正因为如此，红军挺进师遭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两次大规模“清剿”。“闽浙赣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明确提出“以各边区的大部对粟、刘”，而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关于《闽浙赣皖边区绥靖计划》也明确提出“在匪区以军事为先，政治续后”“以兵力摧破匪之武力”“使共匪永无死灰复燃之可能”“以期永决根株”。第一次“清剿”，国民党军32个团连同地主武装共40个团约七八万兵力出动；第二次“清剿”，国民党军6个师2个独立旅连同地方保安团共43个团约10万兵力出动。三年游击作战，红军挺进师牵制和吸引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使其无法参加围追堵截长征中红军主力的军事行动，从而减轻了主力红军长征

的压力，从战略上策应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正是得益于浙南等游击区的三年游击战争，红军主力从长江中下游地区成功转移到抗日的前沿阵地，把中共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定在西北地区，为党和红军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诚如谭震林所说，正是南方的游击战“牵制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

#### （二）支援和掩护了临近游击区的革命斗争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南方各游击区长久陷于国民党的分割围困中，大部皆是独立坚持、各自为战，但是各游击区的革命斗争又在战略上遥相呼应、彼此配合。特别是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国民党军事力量随之调动，部分游击区之间更是一度有了合力作战的机会，直接为对方提供了经济政治上的支援和军事上的掩护。

浙南游击区位于闽浙赣皖四省边界，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其特别的战略意义。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浙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或直接或间接地支援和掩护了闽浙赣、皖浙赣、闽北、闽东等邻近游击区的革命斗争。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后，一路浴血奋战、披荆斩棘，无论是最先开辟的浙西南游

击根据地还是随后创建并最终立稳脚跟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其发展形势之迅猛，革命影响之巨大，都极大地鼓舞了临近游击区的革命形势。而在刘英、粟裕等军政领导的指挥下，红军挺进师机动转移、灵活作战，革命足迹不断拓展，游击战争范围和游击根据地面积也不断扩大，直接支援了临近苏区的革命斗争。而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前后两次的反“清剿”斗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更是有力牵制了敌人的军事行动，由此减轻了敌人对临近苏区的军事压力，从而间接掩护了临近苏区的革命斗争，保卫了临近苏区。特别是红军挺进师和闽东独立师在福建会合后，双方联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对于加强闽浙边党的领导，加强闽东游击区与浙南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和配合，以及为挺进师迅速在闽浙边地区立足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在浙南游击区内，几个游击根据地同样是彼此掩护、彼此支援。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清剿”期间，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斗争直接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大部转移和南下作战的军事行动，到了后期，随着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创建，挺进师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粟裕又多次率队返回浙西

南地区开展革命恢复工作。

正是由于各游击区之间彼此支援、相互掩护，红军和游击队才得以在国民党分割包围和猛烈“清剿”中幸存，从而进一步开展各项革命工作。

（三）发展和壮大了浙南游击区的革命力量

挺进师入浙前夕，浙南革命曾遭遇重大挫折，一度陷入低谷。红十三军斗争惨遭失败，浙南地区党组织同时遭受严重破坏，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红军挺进师入浙后，开辟创建了浙南游击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刘英、粟裕遵循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古田会议“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思想，把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在浙南的战略支点，更是扩大了中国革命在浙南的政治影响。

在党的组织方面，红军挺进师联合闽东特委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并先后成立了中共浙西南、浙东、浙南和浙东南特委，建立了县、乡、区，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建设。而浙南地区的党员一度发展到3000余人，党政群干部500余人。

他们在根据地建设和反“清剿”斗争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发挥了模范和骨干作用，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革命队伍方面，红军挺进师入浙后，一方面充分团结地方革命力量，一方面深入宣传发动群众，使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断壮大。截至1936年末，红军挺进师发展到1500余人，还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这支革命队伍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此外，在平阳集中等待上级指示期间，闽浙边临时省委举办了3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并开办了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为地方和部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革命骨干。在游击根据地内，还普遍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和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各种群众组织，宣传发动人民群众加入到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

虽然经历过国民党的一次“进剿”和两次“清剿”后，党的组织力量和革命队伍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党员由3000多人减为实际不到400人，红军挺进师由1500多人减少到300多人。但这是一支经过三年血雨腥风和枪林弹雨考验的英雄力量，他们以共产党

员为骨干，其中包括一大批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是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的洗礼，浙南游击区的革命力量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浙南这一方红色的革命沃土重新燃起熊熊的火焰，并最终成为整个浙江最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15个游击区之一、成为新四军的策源地之一、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

### 三、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深远历史影响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挺进师在积极打击、牵制国民党兵力的同时，还不畏艰险地开辟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浙南游击根据地作为浙南游击区内的重要革命根据地，是由红军挺进师汇集当地革命力量共同开辟创建的，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烽火的淬炼，日益发展成为浙江地区、华东地区乃至整个南方地区重要的革命战略支点，对此后抗击日寇侵略者、抵抗国民党反动派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而历时三年之久的浙南游击战争，亦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驰

聘抗日疆场和解放战场的革命力量，为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后，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并未因此偃旗息鼓。浙南游击区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继续投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英勇奋战，一直坚持到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

#### （一）抗日战争中的浙南游击根据地

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红军挺进师主力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浙南由此成为新四军的策源地之一。党中央一再强调南方游击根据地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要求“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亲自到浙南进行具体安排部署并特别指出：“浙江地理位置重要，原来的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要留下一些人在浙南继续坚持。”

根据这一指示，刘英率红军挺进师部分干部及武装人员留在浙南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坚持浙南革命阵地。闽浙边临时省委分别在温州城区、平阳、丽水设立新四军办事处，坚持敌后抗战。1938年

5月7日，以刘英为书记的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在浙南平阳北港玉青岩成立，统一领导全省党组织，同时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此后，省委机关多次往来温州、丽水两地，温州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省委机关的常驻地 and 主要活动地。

浙江省委重建后，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根据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有利形势，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浙南地区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至1939年5月浙南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区党员从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时的500余人发展到7000余人，党的支部发展到600余个。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及平阳、瑞安、乐清等地的抗日救亡团体和农民抗日自卫队纷纷建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浙南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国民党顽固派对此惶恐不安，惧怕革命力量日益壮大，于1938年9月下令取缔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等5个抗日救亡团体，又于10月10日查封新四军驻温办事处，蓄意制造反共摩擦，伺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浙南地区各级党组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1939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

代表大会在浙南平阳秘密召开，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是浙江党的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大会之所以选择在浙南召开，是依托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地位。党的坚强领导、良好的党群关系、扎实的统战工作及有利的地理环境，都为大会的召开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大会召开地，平阳北港，亦是当时浙江省委在浙南活动的中心地区，其革命形势与当时整体紧张的政治形势大有不同，“平阳北港区完全赤化，为全省人士所注意，大有浙江陕北之概”。

1940年秋，浙南局势开始逆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持续对浙南基本地区开展武装进攻、进行武装“清乡”，疯狂迫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42年，又制造了破坏省委机关、杀害省委书记刘英的“温州事件”。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浙南特委严格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领导各级党组织转入隐蔽精干斗争，保存和发展了浙南党的组织，并“基本上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及浙南基本地区”。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经先后三次侵占温州。第一次是1941年4月19

日；第二次是1942年7月11日，基本属于骚扰、掳掠性质，时间较短，浙南地区党组织仍然采取隐蔽精干政策坚持斗争；第三次是在1944年9月9日，日寇为防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遂占领永嘉乐清两县。浙南党组织即在瓯北地区积极组建永（嘉）乐（清）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与浙东、浙西两地新四军部队遥相呼应，开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取得抗日反顽斗争的胜利。

日寇第三次入侵温州后，194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曾提出“由浙东派一个精干连（或营）配一部分干部，由刘亨云、张文碧等率领，携带电台，相机挺进至平阳山区与龙跃会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龙跃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沿温州及浙闽交界的海岸线，力求蔓延式的发展”。11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发展东南的部署》要求部队“沿海岸南下，进到温州地区，与浙南龙跃处打通联络，以开展温州南北沿海之游击战争”“经浙南返闽东，以打通至闽中曾镜冰处之联络”。而1945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浙南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浙南为我党将来打通闽浙联络与配合盟

军作战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浙南随我军在闽浙的发展和盟军在浙登陆日期的迫近而日益表现其特殊重要性”，由此可见浙南战略位置之重要。

在抗日战争中，浙南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普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形成有效配合，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浙南基本地区作为党在国统区内的隐蔽根据地，亦有了很大发展。南自福鼎，西到缙云、丽水、云和，跨过瓯江，北达黄岩、仙居，东至玉环，绵亘浙江南部洞宫山、雁荡山和括苍山脉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并依靠严密的交通网连成一个战斗整体，为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扩大与游击战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二）解放战争中的浙南游击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南新四军奉命北撤，国民党浙江省当局即对浙南基本地区实施“清剿”。华中局指示浙南党“坚持隐蔽斗争，坚持浙南阵地”。浙南特委继续执行隐蔽精干方针，保存并发展革命力量。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

9月17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给浙南特委的指示》要求各游击区“应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发展武装，组织群众”，并根据浙南的战略支点地位进一步提出浙南党的发展方向，“西向江山及崇安武夷山方向发展；南向福建，这两个方向要与我们福建党会合；向北发展与浙东党取得联系，准备创造闽浙赣边根据地”。浙南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有计划地从隐蔽斗争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与此同时，爱国民主运动在温州城区及各主要县城深入开展，形成第二条战线。1946年11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沈鸿烈在视察温州后评价，“浙南是浙江最麻烦的地区”。

1948年11月21日，中共浙南特委改称为浙南地委。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在瑞安县桂峰乡板寮村正式成立，形成了主力部队、县区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此后，浙南游击纵队及所属部队在瓯江南部向敌人发起强大攻势，在短短5个月内歼灭大量敌人，相继取得泰顺攻城打援和渡海解放玉环等重大胜利。在浙南人民武装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浙南地委以红军挺进师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创

建的根据地为基础，加强党的建设、人民政权建设、军队民兵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普遍建立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深入开展抗丁、抗粮、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及反霸斗争，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浙南游击根据地。至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渡江南下前夕，浙南境内各游击根据地及游击区不断扩大并基本连成一片。浙南游击根据地面积扩展到1.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人，其范围包括泰顺、文成、平阳（含今苍南）、瑞安、永嘉、青田、景宁、乐清、玉环和福建的福鼎10个县的广大农村，仙居、黄岩、温岭、临海、丽水、云和、龙泉、庆元和福建的霞浦、柘荣、福安、寿宁12个县的部分农村，全面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为配合解放军主力南进作战，浙南地委和浙南游击纵队作出首先解放温州城然后解放全浙南的军事部署。在解放大军南下和浙南游击纵队兵临城下的形势下，国民党温州专员、第二〇〇师师长叶芳率部起义。5月7日，温州城和平解放。与此同时，浙南游击纵队和各县武装及民兵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连克泰顺、文成、瑞安、乐清、平阳、景

宁、青田、温岭、黄岩等县城。至此，除了沿海若干岛屿外，浙南全境获得解放，结束了国民党长达22年的反动统治。

解放战争期间，浙南人民武装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大小战斗190余次，歼敌1.52万人，解放了包括温州在内的14座县城（其中福鼎、柘荣和寿宁是配合野战军解放的），武装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其中纵队主力5116人，县区武装4899人，另外还有民兵9万余人。短短三年，迫使国民党省政府主席、保安司令三临督战、六易专员，连同他们的“勘乱方案”“三光政策”都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

1949年5月29日，浙江省委致电浙南地委：“浙南党在龙跃同志领导之下，自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十余年来坚持了南方敌后的艰苦斗争，保持了党在南方的革命旗帜，保持了党的组织和干部，保持和发展了强大的游击武装，组织武装了广大群众，有力配合了北方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大军渡江以来，机动出击并争取叶芳起义，先后解放温州等十余座县城。你们所获得的这些伟大成就是全党最可宝贵的。华东局及省委对于你们的工作非常满意，并代表全党向坚持浙  
(下转第46页)

## 南雁荡山脉的不老传奇

◇ 潘孝平

南雁荡山脉重峦叠嶂，纵横四方，逶迤峻秀，耸立在北港大地之上。山石雄奇，洞窟诡谲，飞瀑流白。高山峥嵘千秋在，四季苍翠如画，这是大自然亿万年的历史杰作。青山共云天，酝酿人世沧桑。在时光长河里，那些散落在大山深处不老的缤纷传奇，颇可回味，值得钩沉。

商周遗址，据考古调查发现，早在3000多年前，在今水头的雅屿山、腾蛟的凤山、卧牛山、山门的凤岭、闹村的北山、南湖汤家岭等地，就已有人类的活动遗迹。在这些考古遗址中，采集到了商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这是遥远的祖先留给我们不朽的文化遗产。石器有石镰、石矛、石镞头，多为残片，制造方法有打制、磨制。陶片有泥制灰陶、泥制黑陶、印纹硬陶、印纹红陶等，以印纹硬陶为主。可复原器物很少，可辨认的器形有陶质印纹罐、壶、瓮等，纹饰主要有直条纹、方格纹、曲折纹、米格

纹、细绳纹等。这些出土陶片胎体厚，质地硬，做工精细。瓯地先民是一个濒海而居，依山结茅的族群。自古以来是“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绝书》卷八）。北港境内的商周时期人类活动遗址，大抵分布在滨水的低丘缓坡上，这样便于采集狩猎，防止野兽侵袭，又可采水为生，得水之利。

稻桶城，又名炮台山，屹立于水头镇外岙村口，有“古寨雄关”之誉。其山高峻兀立，山岗上怪石嶙峋。峰际有寨墙拱卫，城墙山石垒砌，高丈许，宽三尺，状如一个硕大无朋的稻桶，故而乡人俗称“洪桶城”。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平阳境内“山谷多烽燧，田园半草莱”，各地农民起义军风云涌起，山寨林立。至正十三年（1353）春，浙闽边区的山民在李师、金翁瑞的带领下，组织了一支拥有数万人的

农民军，出没于浙闽交界的长山远水之间。这支农民军曾一度攻克平阳县城，焚烧公廨，劫富济贫，“蔓延平阳且两岁”。至正十五年（1355）八月，农民军进入平邑江面来袭，时摄平阳县事的元将周嗣德带兵渡江与战，李师、金翁瑞所部抵挡不了周的凌厉攻势，撤退到泾口（今水头）西部山区。农民军以稻桶城为前寨，以北峰青湾寨为后寨，互成犄角之势，据险防守。是年冬，周嗣德移兵泾川，纵兵大战，将士闻鼓声而进，引弓齐集，农民军失利。旋即，另外一支农民军在金安三、吴邦大带领下，驰援李、金所部，在泾川山寨同周嗣德指挥的元军展开一场生死战。两军大战三次，因起义军后路被切断，元军坚壁清野，令起义军人心涣散，自相蹂躏，终将溃退。周嗣德率部向北追击数十里，起义军被杀被俘甚众。后周嗣德又用计诱杀李师、金翁瑞等数十首领，同时在阵前高喊：“荷戈来从者，优待之。”许多农民士兵眼看大势已去，便纷纷弃仗投降。

乞丐寨，位于稻桶城西侧五里许，系仕静窑前山主峰。元至正年间，有大批乞讨为生的人寄居于此，故名乞丐寨。因稻桶城一战，起义军溃败，对于归降的农民士兵，不愿继续从军，要

求解甲归田的，周嗣德均予发放两块银元，以作路资。一些农民士兵惯于游走绿林，懒散已久，远离农耕，又觉得没有颜面回家，便选择过着游民日子。仕静窑前山主峰有天然洞穴，可容百人，冬暖夏凉。洞中有泉水，四季不竭，正宜栖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一群人白天三三两两到泾川、山门、凤卧等地沿路行乞，傍晚时分陆续来归洞穴，是以为家。就这样，这一群人在仕静窑前山度过日出日落的苍苍岁月。至于结局，这一拨人或遭遣散，或因厌倦林泉而入世，或终老山中，这已然无人知晓了。但是洞窟遗址今还在，“乞丐寨”的久远传说今还在，至于他们最后的归宿，就留给后人去想象吧。

岩头山窑址，乞丐寨下是岩头山。其在清代之前称窑前山，因此地曾设窑制陶故名。窑址位于仕静村岩头山东南面山坡上，分布面积约八百平方米，堆积层厚1米余。其主要有缸、罐、瓶、壶和少量碗等日常生活器皿。烧制窑具有匣钵、喇叭形支座及垫圈，都是经高温焙烧而成。所烧制的器物纹饰以刻划花纹为主，陶片胎质，坚硬细密，釉色淡青，匀净光亮。从出土器物的标本考证，窑址烧制的年限大体为宋至元代。此处陶窑之所以被废弃湮没，徒留窑址，这或

许跟元朝末年周嗣德的稻桶城一役有关。因稻桶城与岩头山陶窑仅一岭之隔，樯桅毗连，殃及窑前山了。岩头山窑址是平阳县首度发现的一处古窑址。这为研究我县古代制陶技术提供珍贵的范本，2003年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风湾寨，位于水头镇风湾村北面。山势挺拔险要，山下平原一览无余。山顶有一片开阔的平地，前后山坡峭壁陡立，易守难攻。据民国《平阳县志》记载，这里曾有“贼寇”在此立山寨，聚众作乱。风湾寨之名，因一场官兵戡乱而流传下来。明洪武十四年（1381）十月，“括寇”叶丁香、青田县黄坦“寇”吴达三等纠众4000余人，作奸犯科，攻城略地，破青田，杀巡检，焚烧县署。后攻占风湾，在山头扎寨。当时明王朝初立，百废待兴。老百姓在饱受了元末社会大动荡的颠沛流离之苦后，天下民心思定，渴望能够安身立命。民众对于叶、吴等人骚乱乡里之行径，深恶痛绝。镇守平阳的管军千户马俊和校尉肖寿率兵前来围剿，在当地乡民的全力配合下，势不可挡，出林浦，越龙潭，袭击攻破黄湾（今风湾），直抵吴岩山（今吴山）。当是时，风湾一地兵戈方止，四境得以安宁。

吴岩寨，又名吴山寨，位于南雁镇东部，其地蒲潭幽深，峰峦峭拔。风湾一役，叶丁香、吴达三等残部仓皇西遁，凭吴岩山一天然洞穴为据点，负隅反抗。《平阳县志·职官志》载，“吴岩山最号险绝，中悬崖有穴若堂，四面壁立万仞，贼据为穴”。时马俊率官兵乘胜追击，同武士弘的另一支自平邑十八都梅溪入鹤溪包剿的队伍会合，奔袭吴岩山。面对易守难攻的阵势，马俊审时度势，一面挑选一批骁勇有力之将士，沿着石壁，缠抓藤蔓奋力向上攀援，直捣“寇”窝；一面挑选一批技艺精湛的弓弩手，在山谷张弓搭箭以助攻，历经惨烈鏖战，最终攻破吴岩寨，剿杀大部“贼寇”。吴达三在两军混战中率一千人等突围西进，散入了南雁荡山腹地。

银屏寨，位于南雁镇北部小龙里之银屏峰。银屏峰处于南雁荡山的腹地，一峰高耸，四野开阔，一有风吹草动，易于觉察。马俊、肖寿遂率大军于此安营扎寨，并在银屏峰麓建筑一座粮仓，以作补给。官军分兵多路，坚壁清野，深入东溪，进行地毯式搜索，铲除彭坑“流寇”，横扫万松林。历时数月的搜山捣穴，围追堵截，马俊的军队以两百户阵亡的沉痛

代价，攻破大小二十个山寨，擒斩吴达三等1000余人，彻底肃清叶、吴“余贼”，最终平息了这一场“寇乱”，北港地区的连年兵燹方休。如今，银屏峰下的营寨遗址还可辨，粮仓遗址尚存，南雁的后仓村之名仍在，它们勾连起600年前南雁荡山脉刀光剑影的那一场惨烈。

季山寨，位于闹村乡西部季山村。此地处崇山峻岭之中，四围有层层危岩拱卫，只有沿着一条盘山小道蜿蜒而上，抵达山垭口，进入山间谷地。季山村为季氏聚族而居的古村落，系武术世家，为了安境护民，保族自卫，依独特山势构筑山寨，超然世外，自成一统。山寨中季日祐、季日表、季日长等八个兄弟，智勇双全，嫉恶如仇，人称季氏八英雄。时值清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闽人陈仓等地方抗清武装，在平邑南北港竖旗募兵筹饷，为避官兵追杀，一度进驻闹村盆地。过了4年，金华总兵马进宝、温将王晓等率兵前来进剿，陈仓等义军将士相继就擒受戮。时季山村村民及相邻乡民因及时入寨避险，而幸免于难。康熙十五年（1676），清廷贝子传刺塔领兵压境招降，为使村庄免遭生灵涂炭，季山寨随之归清。300多年过去了，如今寨子虽不存，

而遗迹尚在，还有寨后、寨底、寨上谷、寨下谷、寨尖山、营基地等老地名犹在，印证曾经烽火连天的岁月。

金垵寨，位于腾蛟镇西部金垵山上。此地原有金氏人家居住于凤凰山与鲤鱼山交界之拐弯处，故有金垵之名。金垵地处大山深处，险峰沟壑纵横，踞山守隘，固若金汤。山寨始建于元代时期，民间传说姚赛花兄妹武艺高强，行侠仗义，有民族大义。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聚众抗元，为乡民拥戴。后遭官军重兵围困封杀，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山寨沦陷，乡勇义军慷慨就义。今山寨聚义厅遗址尚存，其墙基轮廓依然清晰可辨，大体呈圆形，厚约2.5米，直径约58米，大门朝东。现古寨遗址上建有一座庙宇，当地乡民奉祀山寨大王神像，以表敬意。1994年，古寨遗迹被列为平阳县第一批文保点。在朝代更迭中，穿越漫长的时光，今天我从容地置身于古寨废墟之上。苍穹下，满目青山在望，一阵阵柝金伐鼓，攻城掠寨的厮杀声，仿佛在我的耳际回响，让人油然而生一份悲壮的情愫。

赤岩山，俗名银坑山，位于腾蛟镇湖寮村。赤岩山有瀑，泉源高远，自百仞绝壁潜云而下，訇然震谷。这夺人心魄的“双龙飞瀑”，牵引着山

外人登临的脚步。永初三年（422），永嘉太守谢灵运游屐抵此，也许谢公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物，在他眼里，赤岩山只是“水石之间，唯甘蔗林，高者十馀丈”。那漫山凌云森森的芭蕉林，何其苍苍，这是近1600年前赤岩山上的原始景象。200多年前，诗人张綦毋慕名来到赤岩山，想起了谢太守，不禁吟咏：“谢公遗迹想追攀，何处堪乘兴往还？栀子花开楼石渡，甘蔗林满赤岩山。”只是他难觅当年的芭蕉林，唯有银坑洞窟在目。据民国《平阳县志》载，明永乐十一年（1413），赤岩山银矿开采，朝廷派遣太监前来督办银课，当地民众饱受其苦。正统元年（1436），明英宗下诏封坑，“以苏民困”。清嘉庆年间，乡绅白钦治探访银坑时，慨叹：“银坑洞古信幽深，探宝谁来此地寻。当日富翁何处去，巉岩一片到如今。”而今，飞瀑在，银坑声名在，谢公的传说在，赤岩山依旧在演绎着精彩。

邵子摩崖诗，位于南雁镇后仓之银屏峰后山麓峭壁上。摩崖诗刻正文为：“鳌极初分立，天开图画看。荡深秋雁泊，湫静老龙蟠。淡月萝香永，苍崖瀑溅寒。因怀仙迹古，钟梵殷云端。”落款题刻：“大德九春月

夜邵子题”。摩崖之诗分四行，每行两句十字，末行缩进两格九字。刻字俱颜体，大径寸余，末字稍小。这是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一位自称“邵子”的人所作的五言律诗。这邵子何许人也？700年以来一直是个谜。早前当地就有民谣：“日起晒狮头，日落曝龙喉，若能懂得仙字意，白银九担另一头。”这其中，或许流落着对于邵子真实身份的一个探究。据当地《邵氏宗谱》（1891年修）载，唐景福三年（894），邵永瓘自闽省赤岸迁居平邑南雁后仓小龙里，聚族而居，耕读传家，蔚成大族。南宋时期，邵家甲第蝉联，成为北港望族，世称“小龙邵氏”。宋亡元立，仅仅过去二十六年，这个题摩崖诗的邵子，也许便是邵家之后裔吧。

平阳北港大地上的这一座座山，因代代延续的传奇故事而生动，因人文元素的窖藏而倍加立体。人们在直面远山之时，丰富了仰望的遐想，平添了一缕心灵的感应。但愿神秀的南雁荡山脉传奇不老，家山和人咸好。

（作者单位：平阳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金钱会和江西垟

◇ 胡进士

清咸丰十一年（1861），金钱会正式起事后，队伍分为南北两支。向北一支攻打温州、瑞安，向南一支攻打福鼎。其北攻温州、瑞安的过程，记载比较详细；而南征福鼎的历史，文字记载却颇为缺少，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仅靠口头转述得以流传。随着老辈知情人越来越少，那段历史几乎要湮没于历史长河。为此，笔者根据平阳雷渎温氏族人、夏后垟项氏族人、夏姑桥胡氏族人的口述，参考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咸丰十一年浙江平阳金钱会案》、民国《福鼎县志》、民国《平阳县志》、黄体芳《钱虏爰书》、孙衣言《会匪纪略》、吴一勤《书逊学斋〈会匪纪略〉后》、刘祝封《钱匪纪略》等相关资料，予以初步整理，以期形成清晰脉络。

### 一、赵起三十岁之前在哪里

赵起（？—1863），一作赵启，

晚清浙南金钱会总头领。黄体芳《钱虏爰书》载：“赵起，平之钱仓人，充钱江埠役，其家临江设饭铺。”孙衣言《会匪纪略》载：“赵起者，钱仓埠役，设店以寓客，尝以结盟拜会，聚诸恶少年。”刘祝封《钱匪纪略》载：“有赵启者，平邑钱仓人也，年三十余，设饭铺于其乡，善技击，结交皆拳勇辈，遇贫乏则赠以资财，以是名震江南北，渐至闽疆，亡命之徒，往依者众，人皆称赵大哥。”三者均称赵起为“钱仓人，充钱（仓）江埠役，其家临江设饭铺”，《钱匪纪略》更是明确赵起“年三十余”。那么，“三十余”岁之前的赵起又在哪里呢？从文献中找不出相关史料，但在平阳江西垟民间口述历史中却可以找到答案。

所谓江西垟，即平阳北港（鳌江干流）、南港（鳌江支流横阳支江）交汇处以西水网平原的通称，包括今平阳县萧江镇（不含桃源片）、麻步镇东部



整江流域地形图

和苍南县灵溪镇东部一带的整片平原。《金钱会起义民歌十二首》多次提到江西垟：“九月好景九条垟，江西垟人家哭涟涟。来了乌洋白布会，抢了北港水头垟。”“十一月里雪飞扬，秦如虎兵到江西垟。‘官兵’‘白布’来相会，百姓从此受灾殃。”

江西垟三面隔江，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因而其中的夏姑桥（今属平阳萧江）便成了金钱会的重要据点。对此，“萧家渡附近各村悉皆从贼”（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咸丰十一年浙江平阳金钱会案》），“贼踞夏姑桥”（民国《平阳县志·温和钧传》），“贼之郑卿材、王声三潜回夏姑桥等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咸丰十一年浙江平阳金钱会案》）等史料均有记载。后来，夏姑桥更是金钱会攻打麻步雷读温家团练和南征福鼎的根据地，地位相当重要。据江西垟民间称述，夏姑桥之所以成为金

钱会的重要根据地，跟赵起青少年时期经历和他的少年好友阿右有着很大关系。

在江西垟，关于赵起身世的口述史料，大约有两说：一是赵起出生于夏姑桥，少年丧父，后随母改嫁到钱仓。二是赵起在钱仓出生才几个月，母亲早逝，从小寄养在夏姑桥。查阅《浙江、福建省赵氏总谱》（赵洪靖撰）：“（赵）玉械，名继官，字祖业，生乾隆辛丑年（1781）五月廿三日寅时，卒同治壬戌年（1862）三月初八日戌时。元配周坑蔡氏，生乾隆甲寅年（1794）九月初三日卯时，卒嘉庆癸酉年（1813）七月十八日申时。继配邑城西门章氏，生嘉庆丁巳年（1797）四月初一亥时，卒道光癸巳年（1833）四月二十日巳时，子一。三配店下管氏，生乾隆丙辰年（1796）十二月十六日亥时，卒同治



夏姑桥又名孝姑桥，始建于宋熙宁元年（1068）

甲子年（1864）六月初七日子时，墓与兄同穴（墓移曹堡陈山坑坐东北向西南）。”

“（赵）殿章，字进启，又名起。……生道光壬辰年十一月三十日（1832年12月11日）卯时，卒同治甲子年七月十九日（1864年8月20日）酉时。配埭头颜氏，生道光壬辰年润九月初五日未时（1832年10月28日），卒光绪癸卯年七月初一日午时（1903年8月23），附葬后蟠垅外山猪头，坐艮坤，兼丑未，生子一，女一适河前李继选为室。”谱中所载“玉械”，即赵起之父，相继娶过三个妻室，分别是蔡氏（卒于1813年）、章氏（卒于1833年）、管氏（卒于1864年），其中章氏生一子即赵起。谱中载赵起生于1832年农历十一月，而章氏卒于1833年农历四月，赵起出生与章氏过世前后不足半年。对照《赵氏总谱》与江西垟关于赵起身世的口述史料，赵起从小寄养于夏姑桥的说法，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至于赵起“少年丧父，随母改嫁到钱仓”的说法，现已无可考证。

夏姑桥有着赵起少年生活的许多痕迹。赵起从小住在夏姑桥北岸边，当地人称其为“桥底起”。他小时候跟人学打铜，铜铺在夏姑桥南岸桥头

边。桥头边原来有个水坑叫“火炭井（dǎn）”，老人们称是赵起打铜时淬火用的水坑。少年赵起在夏姑桥时，与当地的项阿右、胡盛槐等几个人很要好，结成义兄弟。赵起翻铸铜钱，铸上“金钱义记”四字，给几个小兄弟当信物。长大后，赵起回到钱仓，组织了金钱会，重铸了“金钱义记”铜钱，作为金钱会信物，就源于小时候这段经历。后来，赵起和阿右率金钱会与雷渎温家团练作战时，就驻扎在夏姑桥边垟心殿。而他少年时几个小兄弟，都成了金钱会骨干，参与攻打雷渎温家团练，并南下攻打分水关、桐山（福鼎县城）等地。

夏姑桥还有更多关于赵起身世的传说。有说赵起是赵宋皇族后裔，住在赵邸，所以叫“赵邸起”（与“桥底起”瓯语同音）。赵邸是个很大的府邸，今萧江镇夏桥社区办公楼所在地原叫“赵邸浹”，就是赵家府邸后花园的大水塘。

## 二、江西垟阿右做“军师”

项阿右（1819—1862），又名项继楼、相楼，夏姑桥附近后垟村项店自然村人，是江西垟关于金钱会传说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能掐会算，还会降大神，有军师之才，自比

刘伯温。他自小与赵起交好，后成为金钱会重要谋略人。据说，为扩大金钱会影响力，阿右特意作了一个策划。一天夜晚，夏姑桥附近江边突然窜起一道奇异的火光，引来许多人过来看稀奇。阿右等人也过来了，说火光下面必有“名堂”。于是叫人挖下去看看，果然挖出一龔（bèng）铜钱，上铸“金钱义记”字样。阿右掐指一算，念念有词：“这是天意，分到铜钱的人就是兄弟，以后同患难共富贵。”这是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以来两千年农民造反屡试不爽的招数，一时间，江西垵参加金钱会者便有成千上万。

后来，江西垵金钱会势力越来越大，与麻步雷渚温家团练起了争端。“温氏，平阳大姓，丁壮数千人，所居渔塘、雷渚，逼钱仓，而誓不入会。生员温和钧、和锵亦皆受牒为团长。贼恨甚，至是袭焚温氏屋。”（孙衣言《会匪纪略》）。据雷渚温氏族入讲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九日（1861年9月23日），赵起、阿右等人以夏姑桥垵心殿为指挥部（民间称“金銮殿”），率金钱会众从夏姑桥过后垵村石桥头向雷渚鸡罩山进攻。金钱会在南首，温家团练在北首，“锐炮互施，不分胜负。至午忽起大



夏姑桥垵心殿，始建于1744年，2012年重建



雷渚温家团练旧址

风，炮烟倒反逆施”，金钱会众趁势杀入雷渚，温家团练不能抵挡，阵亡者有名有姓的达60人。“（温和钧）父儒业陷阵歿，团丁死数十人，众溃，和钧与妻陈氏俱投江死。”族人温垂鼎“见匪纵火烧屋，烟雾漫天，见面不辨，遂沿江而遁，以保全眷属。是夜往投闽省三沙镇，遇同姓把总温得富，暂留营内”。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廿七，金钱会在瑞安沙垵娘娘宫大集会众，兵

分两路：一路北攻瑞安、温州，响应入浙太平军花旗部队；一路南下，攻占福鼎县城桐山，以扼闽浙咽喉，阻挡援浙闽军，并解决物资供应问题。在夏姑桥垞心金村“金銮殿”商议南征福鼎大计时，阿右踌躇满志，指点江山，因此当地留下了“头兴起来阿右一色”的民间俚语，就是脑袋晃起来兴奋得意得跟阿右一样的意思。

但金钱会南征并不顺利，几次攻打分水关都未攻克。直至农历十月中旬，才攻下分水关，进至福鼎县城桐山。同一时间，清军陕安镇总兵秦如虎也已率部抵达福鼎。阿右的南征部队在福鼎城外中了埋伏，败回夏姑桥。农历十二月廿九（1862年1月28日），清军秦如虎部从萧家渡沿江烧杀至夏姑桥。“项阿右起意抗拒，招聚余匪各执刀械迎敌，项阿右杀死兵勇三人”“该匪纠伙持械拒敌，官兵均于阵前殁，复生擒逸犯项阿右、章阿笑、刘森然、刘瑞灏、陈大坤、郑卿村〔材〕、王声三、林有足、林有琴九名”。项阿右被“押解到省”，“照谋反大逆凌迟处死律，应凌迟处死”，但“在监病故”。最后，“项阿右照例剜尸，同各犯并割取首级一并悬示犯事地方，以昭炯戒”。（以上诸条据福建巡抚徐宗干

《为申明金钱会项阿右等分别从重拟罪事奏折》）至此，金钱会南征部队被全部歼灭。

在江西垞民间历史记忆中，阿右是仅次于赵起的金钱会首领，在攻打雷渚和南征福鼎时，都是重要谋划人和实际指挥者。但令人不解的是，《钱虏爰书》《会匪纪略》《钱匪纪略》均不见项阿右名字，在吴一勤《书逊学斋〈会匪纪略〉后》一文中，却赫然记述“（金钱）会首谢公达等焚雷渚温氏”。胡珠生著《温州近代史》亦称：“金钱会谢公达等率众六七千人由灵溪前往福鼎。”据刘祝封《钱匪纪略》，谢公达为金钱会结义八大首领之一，但其身份不详，既不知何处人氏，亦不知是何职业。若谢公达确系攻打雷渚的金钱会首领，雷渚温氏族入应恨之入骨，但温氏族人之口述历史并无提及谢公达其人，项氏族人却确认阿右是金钱会攻打温家团练和南征福鼎的首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编的《咸丰十一年浙江平阳金钱会案》中，收集闽浙总督庆端、福建巡抚瑞瑛（后为浙江巡抚）、福建巡抚徐宗干等关于征剿金钱会的战报奏折15篇，记录了从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至同治元年（1862）八

月，闽军从福鼎、分水关、桥墩门、灵溪、萧江渡、钱仓、平阳城，一直进军至瑞安、温州，剿灭金钱会的一线战事，均无提到谢公达，但明确记述了项阿右等人被擒杀经过，如“秦如虎派员擒获伪军师项阿右一名”。倘如孙衣言《会匪纪略》所言，谢公达被擒这等大事，庆端、秦如虎焉能不提？本文据此认为，谢公达与项阿右应是同一人，“谢公达”为化名。孙衣言《会匪纪略》所载“二十九日，秦如虎兵至萧江渡，尽焚滨江一带诸贼巢，生擒贼首谢公达”，与雷渎温氏族人所述“垂鼎即回家，带族丁二百余人，向三十三都垵心金，捉住伪军师项阿右、假五显神章阿笑，于廿九日辰刻，械送秦营正法”，二者被擒时间相符，亦足说明问题。

### 三、南征先锋胡盛槐三占福鼎城

胡盛槐（1831—1862），又叫胡横、邦槐、士槐，住夏姑桥南岸。胡家自清初由温州迁徙到这里，到盛槐已是第六代，可谓安居乐业，人丁兴旺。盛槐家里经营南货生意，即批发土特产，过得比较小康。照常理说，他没必要冒杀头风险参加造反。他参加金钱会，完全出于与赵起他们的江湖义气，他是金钱会进军福鼎的先锋。盛槐的故事也

很传奇，他比赵起大一岁，从小长得体壮力强，为人慷慨豪爽，与少年赵起交好。在家族同辈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因而在族内有很高的威信。他带领族人成立了一支36人的“护村队”，用挑柴用的两头尖“冲担”当武器，被称为“胡家三十六根冲担”。赵起和阿右创立金钱会后，盛槐义无反顾地加入其中。在金钱会与白布会的几次冲突中，盛槐和他的团队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

咸丰十一年（1861），阿右带队南征时，邀盛槐担任南征先锋。九月廿九，盛槐率先头部队向福鼎进军，与援浙闽军遭遇于桥墩门。先锋队初战不利，后因金钱会大部队赶到转败为胜。十月初五、十月十五，两度猛扑分水关，均因闽军防守甚严，只好退回桥墩门。十月十八，金钱会攻破分水关，分四路三面包抄福鼎县城。在当地会员带领下，先锋队由小路攻入城内，“劫军局，取库银，开禁门，出死囚”。翌日，听说白布会偷袭江西垵，就撤出福鼎回援，中途得知根据地并无危险，又于十月廿四再度占领福鼎城，并驻扎20多天。十一月廿三，前陕安镇总兵秦如虎率军攻入福鼎县城。金钱会守城部队寡不敌众，撤出县城，秦如虎部队追至



水北关隘上的万古亭

水北溪。十一月廿六，金钱会主力反攻水北溪，在万古亭岭下中了埋伏，大败，退至桥墩门。当时，胡盛槐曾率先锋队第三次攻入福鼎县城，却被铁桶似地围在城中。盛槐率部奋力突围，战至最后，发现身后已无一个弟兄，遂凭自己的勇武，抓起旗杆横扫过去，一连撂倒几十人，拼死冲出城来，与其他溃败部队退至桥墩门。十二月十七日，再败退至灵溪。十二月二十日，与秦如虎部队大战于灵溪，先胜后败。十二月（1862年1月）廿一、廿四，金钱会两次反攻灵溪，均告失败，部众四散溃逃回江西垟根据地。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九（1862年1月28日），秦如虎率部由萧家渡沿江烧杀至夏姑桥，江西垟金钱会会员被全部剿杀。胡盛槐逃回夏姑桥，躲在“泥堆垆”（土块垒成的窑）里，最

后还是被清军抓捕，于同治元年正月初八（1862年2月6日）被害。

#### 四、秦如虎屠江西垟

秦如虎，号啸山，山西人，任陕安镇总兵，屡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一年，以陕安镇总兵奉闽督庆端调剿金钱会匪。时粤贼已陷处州，如虎言‘钱匪乌合之众，剿之易耳。温处接壤无重兵驻守，倘匪败而勾引粤贼，祸斯烈矣，请速以大兵驻扎温郡，然后分兵四出，或剿或抚，斯操纵在我耳’。庆督纳其言，师出福鼎桐山，遇钱匪力战却之。适时雷湊温姓毁于匪，有温垂鼎者出为响导，十二月二十九日至萧家渡，尽焚沿江诸贼巢，生擒贼首谢公达”。（民国《平阳县志》）秦如虎认为金钱会是乌合之众，要剿杀很容易。而已进入丽水的太平天国部队如果和温州的金钱会打通后互相呼应，整个局面就难以收拾了，于是建议福建提督庆端从速占领温州。庆端认为秦如虎说得很对，派秦如虎率兵收复了被金钱会占领的福鼎，并引兵至萧家渡，沿江而上，直捣夏姑桥，尽灭金钱会众。

秦如虎是金钱会死对头，又很残忍。他把抓到的金钱会头目轻者以铁丝穿鼻孔，牵着游街后杀头；重者活生生剥皮，抹上菜油，卷在篾箩

里烧，江西垌土话叫做“捋（lia）油砖”。对抓获的金钱会会众，无不施以极刑，从不手软。一时间，夏姑桥两岸尸横遍野，成为人间炼狱。秦如虎在江西垌一带还烧毁大量房子，纵兵劫掠，伤及许多无辜。正如高南英《记匪患》所言：“乃贼氛甫退，而大兵旋至，需索百端，肆夺无忌，民不堪命，莫甚于此！”

江西垌金钱会被歼灭，直接导致了金钱会围攻瑞安城的主力部队腹背受敌，迅速走向溃败。同治元年正月初一（1862年1月31日），秦如虎率部夜渡鳌江，分路夹攻钱仓城，“马云标等各携草具填溪而渡，直捣钱仓石城下，杀入贼垒，立将巢穴焚毁，杀贼数千，生擒百余名”。正月初三，“秦如虎亲督小队直抵平阳县城，搜捕匪党数十名正法”。（《咸丰十一年浙江平阳金钱会案》）同时，北支金钱会在福建记名道员张启煊剿杀下节节败退，正月初四，金钱会金谷山根据地被攻占，至同治元年五月廿一（1862年6月17日），入温太平军与金

钱会余部在瑞安马屿战败，浙南金钱会彻底失败。秦如虎因剿灭金钱会有“功”，升任浙江提督。

金钱会失败后，闽浙边区留下的会员还在秘密活动，后改名红布会、八卦会。同治三年五月十三（1864年6月16日），首领赵辛准备在平阳麻步起事，计划攻打福建福宁府城，不慎走漏消息，随即被镇压，赵辛等人被杀害。至此，金钱会的余脉红布会秘密组织也被彻底清除。

金钱会从1858年创立至1864年金钱会的余脉红布会失败，历时七年之久，会员最多时10万余人，势力影响浙南闽北地区10多个县和温州、福宁等府城，对太平天国的后期斗争起过巨大的支撑作用。但金钱会毕竟只是一次旧式农民运动，既不具备正确的斗争纲领，也缺乏合适的斗争策略，其历史局限性显而易见，其最终失败也是历史必然。

（作者单位：中共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 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

## ——谢文锦传略

谢文锦，谱名用绣，字文锦，后取学名聚霞，曾用名炯华、文进、文近、文景等，浙江永嘉人。浙南党团组织创始人，上海工运、学运杰出领导者，中共南京地委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被国民党杀害，被誉为“浙南第一烈士”。

1894年3月3日，谢文锦出生于浙江永嘉县楠溪潘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谢国广，字善进，号鸿豪。谢国广在潘坑开有炼铁店和中药店，收入不错，家境殷实，在当时的楠溪港算得上“上等人家”，在潘坑村及附近一带是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人称“鸿豪相”。谢文锦少时天资聪颖，性格正直豪爽，而且擅长讲故事，周围的小伙伴总是愿意听他的话，服从他的指挥。他既懂事又孝顺，在家能喂鸡、拔草、养兔、打扫卫生。

谢文锦7岁时，父母将他送到岩头

镇姑父家中，拜普安书院郑继恒老先生为师，后随郑先生到其创办的永嘉广化高

等小学堂就读。他学习刻苦，各门成绩都很优秀，天资又好，往往一教就会、一点就通，深受老师的喜欢和赞赏。谢文锦的学习方法也与人不同，比如先生叫大家跟读时，其他同学都仰起头，照本宣科咿咿呀呀、摇头晃脑地读一遍，他总是不声不响，却总能流利地背诵完全文。郑先生把谢文锦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

就在谢文锦在学堂孜孜不倦地接受教育时，辛亥革命爆发，新思潮像春风一样吹遍全国。谢文锦满怀美



谢文锦（1894—1927）

好的理想，于1912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可是，残酷的现实使他的梦想破灭了，校内一些封建遗老对谢文锦等来自穷乡僻壤又渴望进步的学生百般歧视、凌辱，还禁锢其思想。年轻的谢文锦愤愤不平，他有理有据地反抗校方的专制高压，最后校方以“思想过激”为借口，将其开除。

从第十中学校肄业之后，谢文锦并没有气馁，在郑恻尘、胡公冕等人的支持下，1913年，他考入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继续学习。在一师读书期间，谢文锦密切关注世界革命和国内政局的变化，被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运动所震撼，经常与师友们交流联系，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爱国民主的思想越发坚定，并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诤友。

1918年，谢文锦从一师毕业回乡，进入岩头高等小学任英语教师。楠溪乡下学生第一次读英语时都觉得十分稀奇，全班的孩子们都笑成一团。谢文锦面对楠溪孩子方言口音严重、英语读不准的情况，总是十分耐心地教导和纠正。他教书认真，待人和气，不摆架子，常常和学生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夏天还带学生到河里游泳，师生之间十分亲密。同时，

他还经常向学生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革命道理，热心培养人才。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引起当地顽固势力的恐慌和仇视。顽固势力加大了对他的攻击，他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19年，谢文锦担任校长后，进行了教学改革，大胆采用内容健康、进步的课本，同时还节衣缩食、变卖家产来筹措新建岩头高小的经费。谢文锦在永嘉楠溪江畔播撒了革命种子，使永嘉人民较早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培养了金贯真、李得钊等一大批革命先进分子。正是这批先进分子，点燃了浙南革命的圣火。

1920年“一师风潮”爆发，谢文锦辞去校长职务奔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上海，与一师的校友及其他进步青年一起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0年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青年团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所在地，即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开办了中共党团组织的第一所培养青年革命者的学校——外国语学社。谢文锦为外国语学社的首批学员，在这里，他结识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革命知识分子。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些学生中发展了二十几名团员。谢文锦作为首批人选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并任执行委员，成为温州地区最早的一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1921年，谢文锦被派遣到俄国学习，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此期间，谢文锦亲身体会和了解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情况，亲眼看到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他的思想再次得到了升华。他在饥寒交迫的艰苦环境中，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不仅刻苦学习，而且积极参加劳动，俄国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和同学们学习、生活、劳动的身影。

苏俄政治经济社会的新气象深刻激励着谢文锦。留学期间，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了解了无产阶级革命道理，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1922年12月，谢文锦成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在投身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而光荣的一步。

谢文锦入党后认真履行党员职责，多次参加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又称“旅莫组”）会议和东方大学党团员大会等，并身体力行带动和影响旅居苏联的同乡投身革命。1922年冬，萧三（原名萧子暲）从法国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成为谢文锦的同学。谢文锦热情辅导萧三学俄语，提高萧三的俄语水平，还

教他唱俄文歌曲《光明赞》，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和萧三一起用中文翻译了《光明赞》，传唱到全国各地，鼓舞中国人民向着光明前进。1923年10月，旅莫支部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二期支部委员会，彭述之为书记，谢文锦担任支部技术书记。这是谢文锦入党之后担任的第一个党内职务。在旅莫支部委员会里，谢文锦认真严谨、细致踏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为旅莫支部各项工作的开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为推动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发展，旅莫支部陆续派人回国。7月，谢文锦与萧劲光等一行10人回到了离别3年的祖国。随后，谢文锦立即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上海地委”）委员。当时上海地委委员只有3人，谢文锦担任秘书兼组织部主任。他负责上海地委组织工作后，认真履职、勤勉工作，使上海的地方党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

同年秋，为推动上海附近及江浙地区的党组织建设工作，谢文锦奉中共中央之命，回温组建党团组织。在温期间，他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团员，以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向工人、农民、学生生动地介绍十月革命的伟

大胜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永嘉（温州）城区和楠溪，利用探亲访友、开座谈会、大会演讲等各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阐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揭露、痛斥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指出只有彻底推翻他们的统治，中国人民才能获得新生。他的讲话生动有力、精辟深刻，吸引了许多听众。

他在积极宣传的同时，着手做细致切实的组织工作。他对进步青年进行深入了解和考察后，与他们推心置腹地谈话，启发他们的觉悟，并为入党的同志写了中肯的鉴定意见上报党中央。1924年冬至1925年春，他先后发展了郑恻尘、胡识因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0月，在浙南开展革命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后，谢文锦离开温州返回上海。12月，在他的指导下，浙南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随后，在谢文锦、胡识因、郑恻尘等人的推动下，温州独立支部的力量发展很快。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谢文锦还在浙南开展建团工作，他先后介绍了金贯真、李得钊等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力量也逐步壮大。

返回上海工作后，谢文锦仍时刻关心温州独立支部的情况，从1924年10月至1926年6月，他通过各种途径，及时地把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带给温州独立支部，使温州独立支部与党中央保持紧密的联系。他还多次回温州开展革命活动，使家乡的先进分子进一步接受了马列主义。

在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的同时，谢文锦自己仍孜孜不倦地钻研和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在1925年4月的《新青年》纪念列宁专号上，登载了他撰写的《列宁与农民》。文中指出：“俄罗斯的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所以能够集合这样伟大的力量，得到最后胜利，他的政权又一天巩固一天，其原因不但在于他的奋斗目的很对，他的奋斗方法能适应环境及多数派的先锋队能和工人阶级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在于他同时又能够注意到农民的心理和利益，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去奋斗。这就是多数派的首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无产阶级的指导者列宁同志指示给工人农民群众的一条很正大的道路。他在历史上的大功绩，一部分也就在乎此。”此文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被选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它是党早期系统地介绍列宁论述农民问题

的重要文章，在以后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中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谢文锦于1924年10月从温州回到上海后，立即投入到上海火热的革命运动之中，上海党组织建设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后，上海地委“实际上恢复了暂时代行区执委的职权，领导包括上海和江苏、浙江两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中共组织”。领导的地区范围扩大了，但领导成员没有增加，委员会仍只有委员3人。身为秘书兼组织部主任的谢文锦责任更加重大，事务十分繁忙，奔波于江浙两省，在农运、工运和学运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4年下半年，曾一度低落的上海工人运动又活跃起来。上海地委以上海大学学生为骨干，深入到工人中开展工作，在沪西、沪东、浦东等区创办了7所工人夜校。到年底，已有19家中外纱厂秘密建立俱乐部，会员近1000人。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人政治觉悟的提高，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基础。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谢文锦等人组织和发动工人进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夜里，谢文锦根据中央的指示，召开上海各界代表大会，指导和帮助与会人员，最终形成上海各

界代表大会对五卅惨案的《十二条决议》，当晚上报中共上海地委，成为发动和指导五卅运动的发令枪。5月31日，上海各界按照谢文锦等人起草的《十二条决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晚，上海各工会召开联席大会，通过成立上海总工会，谢文锦任总务科副主任。自此，谢文锦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6月2日，上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的“三罢”运动。中共上海地委、上海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舍身忘我地辛劳工作。谢文锦经常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经常要接受媒体采访，经常要发布各种指示和讯息。6月初，因为暂时主持总务科的工作，谢文锦还曾经被新闻界称为“上海总工会负责人”。

6月底，上海总工会成立救济委员会，由谢文锦兼任主任。谢文锦毅然接受新使命，在工人经济来源遭遇危机的紧急关头，领导上海总工会救济委员会，迅速担负起了募款和发放募款的重担。谢文锦严格管理各项财务收支，要求工作人员制作各项收支的详细报表。有一次，有三块银圆多下来，他的原配妻子周莲朓向他要一块零用。谢文锦很严肃地说：“一块也不能拿，我们只有捐献的义务，没有

私用的权力。”

上海总工会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引起了反动势力的仇视。9月18日，占据上海的奉系军阀手下的淞沪戒严司令部和淞沪警察厅突然派出大批军警，驱散了上海总工会的纠察队，将上海总工会位于闸北宝山里2号的会址封锁了。9月25日，上海区委（于8月21日由上海地委改称，亦称江浙区委）决定上海总工会转入地下斗争，同时改组上海总工会党团，谢文锦被选为党团（相当现在的党组）成员之一，进入了上海总工会的领导核心层，分管负责上海总工会宣传工作。次年3月，谢文锦担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兼曹家渡部委书记，负责起一方总体工作。

1926年7月，为改变南京地委的工作局面，尽快发展南京地区的革命工作，上海区委决定，急调谢文锦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主持南京地委工作。作为党的优秀干部，谢文锦义无反顾，毅然接受了党交给他的任务，奔赴杀机四伏的南京城。这段时间，他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以满腔热忱投入到忘我的革命工作中。1927年2月，中共江浙区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谢文锦任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及政治、工人问题委员会委员，承担

了更加繁重的任务。在这次大会上，谢文锦再次当选为江浙区委委员。大会结束后，谢文锦领导南京地委信心百倍地投入新的战斗。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下了南京。就在这一天，英、美等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城，无数中国人倒在血泊中，惨不忍睹。愤怒的民众在以谢文锦为首的中共南京地委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为发展大好的革命形势，把各行各业的人民迅速组织起来，25日，在谢文锦的直接领导下，南京市总工会宣告成立。在此前后，各行各业的革命团体纷纷组织起来，并在北伐军的支持下，将革命运动推向高潮。

4月上旬，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凶相毕露，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金陵古城面临一场大劫难。谢文锦和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上海临时政府委员侯绍裘等立即动员和组织力量，号召大家抛弃幻想，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谢文锦召集南京工人、学生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100多人开会，严肃而坚定地宣布：“暴风雨就要来了，有些人的面目越来越清楚，我们不能坐着不动了。在座的都是党团员积极分子，是革命的中坚力量。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总是有牺牲

的。我们不怕牺牲，我们要组织力量和敌人对抗！”

4月9日，蒋介石到南京亲自策划指挥，逮捕了在国民党江苏省、市党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同时捣毁了总工会。当晚，中共南京地委举行各革命团体负责人会议，决定第二天上午召开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大会。10日，约10万群众参加大会，并举行了游行示威，但下午遭到了反动武装的冲击。当夜，谢文锦在大纱帽巷10号召开地委紧急扩大会议，着重研究部署应变措施、反蒋宣传及共商善后等问题。会议通过了“同胞们！起来！罢市！罢工！罢课！起来打倒叛党的蒋介石！”等标语。由于会议仓促、保密工作未到位，会场被敌人发觉。深夜，会议还在进行中，国民党南京公安局侦缉队队长赵虎臣带领便衣武装50余人突然包围了会场，谢文锦、侯绍裘等10人不幸被捕。这就是南京四一〇反革命事件。

谢文锦等人被捕后，凶残的敌人对他们使用了极其残酷的刑罚，但他们始终宁死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崇

高的革命气节。敌人一无所获。几天后，蒋介石密令赵虎臣将谢文锦等人秘密杀害，他们有的是死后被装入麻袋，有的是先被装入盛有石灰的麻袋再被残忍地刺死。最后，敌人把谢文锦等人的遗体运到南京通济门外九龙桥上，沉入秦淮河中。

英勇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党早期的优秀党员、温州地区党团组织的创始者谢文锦，就这样壮烈地牺牲了，时年33岁。战友萧三在回忆文章里沉痛地写道：“他的尸体和英灵流进了滔滔的大海，他的英勇献身精神以及他在‘东大’和我的友谊，将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新中国成立后，谢文锦烈士的遗像和遗作陈列在南京雨花台、温州江心屿等地的革命烈士纪念馆。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谢文锦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他的革命业绩和英勇献身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文章来源：《浙南百名英烈传》）

## 不避艰险 坚贞不屈

——郑馨传略

郑馨，原名景柳，字德甫，曾用名撼山、竹山、吕人望，浙江瑞安白门乡（今属瓯海区丽岙街道）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兼中共永嘉县委书记，中共浙西特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常委、常委、省委秘书长，中共杭州市委书记，中共浙北特委书记等职。1931年12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后转押到浙江陆军监狱，1932年7月惨遭杀害。

1901年10月19日，郑馨出生于浙江瑞安县白门乡（今属瓯海区丽岙街道）。他8岁入本地启蒙馆读书，1919年秋，考入瑞安县立中学（旧制），成绩优良，担任副班长。1923年秋，从瑞安县立中学毕业后，因向往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到北京报考外交部办的北京俄文法政专科学校，未被录取，就留京自学、进修俄文。次年秋，考取北京俄文法政专科学校。

郑馨在求学期间，曾聆听过苏联革命家于思伟的访华报告和李大钊关于“苏联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讲座。通过学习和思考，他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于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郑馨入党后，在中共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下，发动本校同学掀起反对守旧派校长的风潮，并上书外交总长沈瑞麟，要求改“俄文法政专科学校”为“中俄大学”。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亲自活动。由于各方支援，“中俄大学”的牌子终于竖了起来。这一斗争的胜利，显示了郑馨的组织才能和宣传活动能力。



郑馨（1901—1932）

1926年初，全国政局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条件逐渐成熟；另一方面，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新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日盛。军阀吴佩孚与张作霖重修旧好，重新进驻京津。校中的反动势力日盛，校名仍恢复为“俄文法政专科学校”。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郑馨被校方开除，到设在天津的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受罗章龙的领导。1927年1月底，郑馨经上海回温，参加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活动。

1927年2月初，北伐军东路军打败军阀周荫人部后，先头部队第十七军由军长曹万顺率领由闽入浙，经过平阳、瑞安到达温州。党组织发动群众举行欢迎北伐军大会。各县的革命斗争形势高涨，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帮助国民党在各县建立县党部，并公开活动，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2月中旬，温州独立支部指派郑馨到瑞安指导工作。这时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之际，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郑馨告诫中共瑞安特别支部书记林去病，眼前局势虽好，却存在国共分裂的危险，要提高警惕。于是林去病借故辞去国民党瑞安县党部常务委员职务，带领部分党员深入农村，开展农

民运动。郑馨则不避艰险，回到了尚在军阀盘踞之下的北京，参加革命斗争。

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公开反苏反共，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等19位共产党员被捕并被杀害。由于北京的形势恶化，郑馨等人离开北京，辗转至武汉找寻党中央。5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了浙江省党部黄胤、温州总工会郑馨向中央报到的消息。在武汉期间，郑馨在党中央秘书处工作。不久，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之后公开反共，实行宁汉合流。党中央遂转移到上海，革命形势十分危急，郑馨无法在武汉立足，只好返回家乡瑞安。此时，温州地区的国民党正在进行“清党”，各县城都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共产党人已转入地下、转入农村。

郑馨因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永嘉、瑞安的反动派对他不大注意。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联络林去病、陈卓如、郭演九等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秋收斗争。他先后在瑞安白门、下墩、下嵎、河头、上坦、沙渚、杨宅等地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但自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温州独立支部与党中央、上级党组织

失去联系，原领导人或被捕或牺牲，有的党员已经避居外地，留下的党员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状态。于是，郑馨决定到上海找寻党中央。经过许多曲折，他在上海找到了党中央，12月，他奉中央指示来到宁波，找到从杭州迁到宁波的中共浙江省委。在宁波与省委书记夏曦会晤后，夏曦派他到温州恢复与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1928年1月，郑馨作为浙江省委特派员，经上海到温州，找到了分散在各县坚持斗争的党员骨干。1月下旬，他在瑞安城关主持召开永嘉、瑞安、平阳等县党的主要负责人会议。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恢复与整顿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暴动，并确定了各县县委负责人。郑馨兼任中共永嘉县委书记，从而使脱离上级领导的温州地区党组织与上级恢复了联系。3月，省委又派林平海、王屏周回温州协助郑馨工作。在郑馨等人的领导下，永嘉、瑞安、平阳等县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无田会、贫农团、雇农会等组织相继建立。通过减租、增加雇农工资、平糶粮食，开展与地主豪绅的斗争，广大农民斗争情绪不断高涨。在此基础上，召开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6月下旬发动永嘉、瑞安、平阳、3县联合大暴动。

这次暴动，由于农民手中只有刀、棒和少量土枪、土炮，又是临时集合没有经过训练，加上缺乏经验、布置不周、步调不一，盲目攻打县城，最终失败。但暴动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同时反映了浙南人民要求革命的迫切愿望和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

1928年9月，中共浙江省委任命郑馨为中共浙西特委书记。当时，中共浙西特委和中共兰溪县委犯了“单纯烧杀和依靠器械较劣的少数武装农民与省防军直接冲突的军事冒险和盲动行为的错误”。郑馨到浙西后，遵照省委指示，全力纠正浙西的盲动错误，同时也反对和平发展。9月下旬，永康、武义两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暴动。郑馨得讯后，即于10月11日发出《浙西特委致永康、武义县委的指示信》，指出联合暴动是“军事冒险、军事投机”，“万勿盲动”。但永康、武义两县已在10月10日同时发动武装暴动，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特委对擅自组织暴动行为作了严肃批评，并指明应遵循的工作路线。早在10月7日，郑馨在《致宣平县委函》中说：“要反对和平发展，尤要反对盲动主义。”可惜，宣平县委虽然也曾努力制止盲目的暴动，但在11

月初，群众自发集合队伍进行暴动，失败后被捕50多人，党组织的负责人只得暂避外县。

10月底，郑馨召开浙西特委临时执委会议。会议认真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通过了《浙西目前工作大纲》，提出今后的工作路线“要领导工农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从斗争中去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培养群众斗争力量，建立城市工作基础，并提高群众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并要求已建立县委的13个县要健全机构和工作制度，未建立县委的6个县在原有党组织的基础上立即成立县委。浙西特委将所属22个县划分为4个区域，分别以兰溪、永康、严州、衢州为中心派驻特委委员就近联系、加强领导。

郑馨派员巡视建德，发现中共建德县委中有人想乘机打入国民党，用国民党的名义去发动组织群众。于是，11月10日发了《特委致建德县委函》，指出“绝不许以国民党的名义去组织群众，无论工会、农会都须作反国民党之宣传，揭破国民党种种丑态于群众面前”，指示建德县委继续洗刷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余毒，这对建德县委的工作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11月到12月初，浙西特委还给

宣平、龙游、东阳、缙云、武义等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县继续努力纠正机会主义、尤其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同时根据各县的具体情况，给予具体的工作指导。不久，中央指示要加强杭州、宁波的工作，决定撤销浙西特委，各县委归省委直接领导，并在兰溪设立交通分局。郑馨担任浙西特委书记时间仅3个月，他和严汝清、邱福祥等人积极工作，制止盲目暴动，保存和发展党组织，使浙西地区的革命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28年12月，在党中央批准中共浙江省委报送的新省委名单中，郑馨为候补委员。1929年1月中旬，郑馨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常委，不久，担任了省委秘书长。两个月后，省委决定重组中共杭州市委，由郑馨兼任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市委重组后，在恢复原有组织机构的同时，又发展了许多新的关系。4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浙江工作会议，作出了《浙江问题决议案》，决定暂时取消浙江省委建制，将杭州、宁波、温州、台州、湖州、兰溪6个重要地区划分为6个中心县委，直属中央领导。6个中心县委之一的杭州，在此之前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无法工作。根据会议精神，中共杭州中心市委于4月

19日正式成立。由于斗争形势和环境的恶劣，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成员经常被捕、牺牲，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5月12日，郑馨奉中央指示赴杭重组杭州中心市委。经过努力，杭州中心市委很快恢复了工作，并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地区，尤其是杭州，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庞大、防范严密，市委的工作遇到许多困难。为此，郑馨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8月，党中央改派邵天明等3人到杭州，将杭州中心市委改为杭州市委，改派郑馨到吴兴、长兴等地巡视。12月21日，中共杭州市委机关再遭敌破坏。1930年3月5日，党中央确定杭州市委名单，郑馨第三次出任杭州市委书记。同年4月30日，在中央巡视员卓兰芳的主持下，杭州成立了以党、团、工会为主体的杭州市行动委员会，郑馨任书记。杭州市行动委员会成立后，积极领导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农民武装暴动。但是这些革命运动不断遭到反动派的镇压，革命力量损失很大。6月2日，杭州市行动委员会结束活动。6月，中央决定恢复杭州市委建制，郑馨任书记。

1930年8月下旬，根据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的指示，浙江成立浙北总行动委员会，由卓兰芳任书记，郑馨任

委员（未到职）。为配合浙南红十三军的军事行动，郑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义乌县筹建工农红军。

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纠正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党中央决定在杭州建立隶属江南省委领导的中共浙北特别委员会，负责整理杭、湖、宁、绍和金华、诸暨等地的党组织，郑馨任书记。不久，郑馨调上海工作。

1931年12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反共头子何秉达派特务带着叛徒到上海，侦知郑馨在上海英租界。他们勾结英租界巡捕房，于12月15日在上海戈登路将郑馨逮捕。郑馨先被羁押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后转押到浙江陆军监狱。1932年7月，郑馨在浙江陆军监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1岁。

郑馨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深谋远虑、呕心沥血、不避艰险、坚贞不屈。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为了开拓新时代的征途而奋勇前进！

（文章来源：《浙南百名英烈传》）

编者按：温州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发祥地，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在任永嘉太守期间，留下了大量描写温州秀美山川的诗作，开创了山水诗派。温州江心屿，因历代著名诗人谢灵运、李白、杜甫、孟浩然、韩愈、陆游、文天祥等相继登临，并多有题咏传世而声名大噪，被誉为“诗之岛”。赵宋南渡后，温州曾一度人文鼎盛，出现了王十朋、“永嘉四灵”、林景熙等著名诗人。如说温州“诗脉绵长，底蕴深厚”一点也不为过。正因如此，《温州史志》从本期开始，特开辟【诗意温州】专栏，介绍历代与温州有关的诗人与佳作，以飨读者。

## 《登池上楼》赏析

### 登池上楼<sup>①</sup>

南朝 谢灵运

潜虬媚幽姿<sup>②</sup>，飞鸿响远音<sup>③</sup>。  
薄霄愧云浮<sup>④</sup>，栖川怍渊沉<sup>⑤</sup>。  
进德智所拙<sup>⑥</sup>，退耕力不任<sup>⑦</sup>。  
徇禄反穷海<sup>⑧</sup>，卧疴对空林<sup>⑨</sup>。  
衾枕昧节候<sup>⑩</sup>，褰开暂窥临<sup>⑪</sup>。  
倾耳聆波澜<sup>⑫</sup>，举目眺岖嵚<sup>⑬</sup>。  
初景革绪风<sup>⑭</sup>，新阳改故阴<sup>⑮</sup>。  
池塘生春草<sup>⑯</sup>，园柳变鸣禽<sup>⑰</sup>。  
祁祁伤豳歌<sup>⑱</sup>，萋萋感楚吟<sup>⑲</sup>。  
索居易永久<sup>⑳</sup>，离群难处心<sup>㉑</sup>。  
持操岂独古<sup>㉒</sup>，无闷征在今<sup>㉓</sup>。

#### 【注释】

①池：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所居

园子里的水池，今在温州市鹿城区，后人称为“谢公池”。

②潜虬：潜藏的龙，象征隐士；媚：适意，自我怜惜；幽姿：幽静的姿态，喻悠闲。

③飞鸿：高飞的大雁，象征仕宦者；响：发出；远音：悠远的鸣声。

④薄：迫近，靠近；霄：云霄；愧：惭愧。

⑤栖川：栖居于深渊；怍：愧疚；渊沉：指深渊中的潜龙。

⑥进德：增进道德。出自《易经·乾卦》：“君子进德修业。”意为增进道德，扩大功业。

⑦退耕：退隐耕作。

⑧徇禄：追求俸禄；反：返回；穷海：边远的海滨，指永嘉郡。

⑨疴：病。

⑩衾枕：被子枕头，指躺在床上；昧节候：分不清季节变化。

⑪褰开：揭开帷幕，打开窗子。

⑫聆：听。

⑬岖嵌：山势险峻的样子。

⑭初景：初春的阳光，景，同“影”；革：消除；绪风：余风，指冬天残留下来的寒风。

⑮故阴：过去的残冬。

⑯塘：堤岸。

⑰变鸣禽：鸣叫的鸟儿换了种类。

⑱祁祁伤幽歌：“采蘩祁祁”这首幽歌使我悲伤。祁祁：众多的样子；幽歌：指《诗经·幽风·七月》“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句子。

⑲萋萋感楚吟：“春草兮萋萋”这首楚歌使我感伤。萋萋：茂盛的样子；楚吟：指《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凄凄”的句子。

⑳索居：独居；易永久：容易感到日子长久。

㉑群：朋友，众人；处心：安心。

㉒持操：保持节操；岂独古：难道只有古人才行。

㉓无闷：没有烦闷。出自《易经·乾卦》：“遁世无闷。”，意为贤人能避世而没有烦恼；征：验证，证明。

【译文】潜藏的龙，姿态是多么的悠闲，多么的美妙啊！高飞的大雁，声音是多么的响亮，多么的悠远啊！我想要停留在天空（进取功名），却愧对天上的飞鸿；我想要栖息川谷（隐退潜藏），却惭对深渊的潜龙。我想进修道德，建立功业，却才智笨拙；我想退隐山林，从事耕作，力气又无法胜任。为了追求俸禄，我来到这偏远的海边做官，加上又卧病在床，面对着光秃秃的树林。（每天）蒙着被子，靠着枕头，浑不知季节气候的变化。偶然间揭开窗帷，暂且出去登临眺望。倾耳细听波涛拍岸的声音，举目眺望巍峨高峻的山岭。初春的阳光已经代替了残余的冬风，新来的阳气也更替了去冬的阴冷。（不知不觉）池塘已经长满了春草，园中柳枝上的鸣禽也变了种类、换了声音。想起《诗经》里《幽风·七月》这首诗，真使我伤悲，想到《春草生兮萋萋》这首楚歌，更是让我感慨。唉！独居的生活真容易让人觉得时间难捱、特别长久，而离开朋友的处境也真是让人难以安心。坚持节操哪里仅仅是古人才做得到呢？《周易》里所谓的“遁世无闷”今天在我的身上已经得到验证了。

【赏析】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写诗人出任永嘉太守时的矛盾心情，懊悔自己既不能像潜藏的虬那样安然退隐，又不可能像高飞的鸿雁那样声震四方，建功立业。第二层写他在病中临窗远眺。第三层写他的思归之情。

前八句为第一层，主要写官场失意后的不满与当时矛盾的处境。魏晋南朝时代权力斗争激烈，仕途风波险恶，因此士族文人既有进取之志，又有企羡隐逸之心，而诗人面临的却是两者俱无所得的困境。诗一开头即由此下笔：“潜虬”一句喻深藏不露、孤高自赏的生活，“飞鸿”一句喻奋进高飞、声名动世的境界；下面两句说无论前者还是后者，自己都不能做到，深感惭愧。四句中，第三句紧接第二句，第四句远承第一句，诗意连贯而有变化。以上四句用形象的比喻写出自己的困境，但为何会这样，并未交代清楚，所以又有后四句把前四句加以落实。“进德”谓进取功业，施恩德于世人，与“飞鸿”一句相应。虽有此志，却是才智不及。这句实际的意思，是说自己耿直守正，乃至受人陷害。“退耕”谓退隐田园，以耕作自资，与“潜虬”一句相应。但徒怀此愿，却是力所未能。以谢氏

的富有，当然谈不上“退耕力不任”的问题。这句实际的意思，是说自己颇有退隐之心，只是为形势所迫，无法实现。因为当时谢灵运如果拒绝赴任，就是公开表示与当权者对抗，极可能招致更大麻烦。下面进一步写自己于无奈中来到这偏僻的海隅，入冬后久卧病床，所对唯有萧索枯瑟之空林。全诗由虚入实，由远及近，气氛渐渐降到最低点。

自“衾枕”以下八句为第二层，写登楼所见满目春色。“衾枕昧节候”紧承前一句“卧疴对空林”而来，写卧病中不知不觉，已是冬去春来，同时自然而然引出下句“褰开暂登临”。“暂”谓短时间，有抱病强起之意。“倾耳”“举目”两句，写出诗人对自然风光的极度喜爱。池塘水波轻拍，在倾耳细听之际，令人虑澄意解；远山参差耸立，于放眼遥望之中，使人心旷神怡。眼前是一派景色：“初景”即新春的阳光，正在革除“绪风”即残冬的余风，“新阳”即春代替了“故阴”即冬的统治。“初景”“新阳”写出总体的感受，是虚笔，下面“池塘”“园柳”两句，转为近景的具体描绘。“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诗中最著名的诗句之一，曾得到很多人的

赞赏，甚至引出一些带有神秘性的传说。王国维指出此句“妙处唯在不隔”，意指这两句诗如出水芙蓉般清新自然，看似偶然天得，却没有苦吟冥想矫揉造作的痕迹。更有后人评价此句“惊天动地至今传”“万古千秋五字新”。钟嵘《诗品》引用《谢氏家录》的传说：“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更让这句诗的来源增添了神秘之美。但也有人提出：这二句实在很平常，没有什么可夸耀的。究竟应如何看待，颇可稍加分析。

看起来，这一联诗（特别是前一句）确实很平常，毫无锤炼之功，所写景色亦并无特别之处。但应该注意到，它很好地表现了初春之特征及诗人当时的心情。池塘周围（尤其是向阳处）的草，因为得池水滋润，又有坡地挡住寒风，故复苏得早，生长得快，其青青之色也特别的鲜嫩，有欣欣向荣的生气。但它委实太平常，一般人都注意不到。谢灵运久病初起，这平时不太引人注意的景色突然触动了他，使之感受到春天万物勃发的生机，于是很自然地得到这一清新之句。“园柳变鸣禽”，写柳枝上已

有刚刚迁徙来的鸟儿在鸣叫，这同样是细微而不易察觉的变化。两句诗表现了诗人敏锐的感觉，以及忧郁的心情，在春的节律中发生的振荡。再有，南朝诗坛，以谢灵运为代表，有一种追求佳句的风气，而通常的佳句，都以反复雕琢、精于刻画取胜。在这样的风气中，此种自然生动而富有韵味的诗句，更显得突出。总之，放在特定的文学环境和具体的诗篇之中来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确不失为佳句，单独抽出来加以评论，就没有多少意义了。从全诗来看，写到这里，情绪渐渐转向开朗欣喜的暖色调。

第二层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诗人在病榻上度过了一个冬天，现已是初春时节了。他凭窗而坐，倾耳细听远处波涛拍岸之声；举目远望群山起伏之影。而近处所见的景致则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诗人从冬去春回的众多景象中选择一个细小而典型的镜头：不知不觉间楼外枯草瑟瑟的池塘里竟然春草繁生了；小园垂柳丛中禽鸟鸣声也已变换。正是从池塘园子的变化中，久病的诗人突然意识到，外面已是一派浓郁的春意。这里写景，有声有色，远近交错，充满了蓬勃的生气。“池塘”二

句历来为诗论家交口称道，它的妙处就在于自然清新，不假绳削。

最后六句为第三层。开头两句由登楼观春联想到古代描写春景的诗，借用典故表示自己的感慨，情绪又转向感伤。“祁祁伤幽歌”的“幽歌”，指《诗经·邶风·七月》一篇，诗中有“采芣祁祁”等描写春景之句。“伤幽歌”，按照《毛诗序》《诗谱》等传统的解释，《七月》是周公在遭受流言、出居东都以避谗害时作的，谢灵运用此典故，带有暗喻的意思。“萋萋感楚吟”的“楚吟”，指《楚辞·招隐士》一篇，其中有“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所谓“感楚吟”，是说有感于隐士的生活。这两句回复到第一层的内容，但并非单纯的重复，而是表示要从困窘的处境中摆脱出来，决心走隐居的道路。接着“索居”“离群”两句，写隐居生活令人难以接受的一面，意思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使人容易感到岁月漫长，枯索无味，难以安心。这两句从诗意上说，是指一般人的想法，并非说自己。但在潜在心理上，这种被否定的想法，也隐约透露了他自己的某种疑虑。谢灵运出身华胄，为世人所重，且骄纵自负，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对于他确非易事。但不管

怎样，他归隐的决心已下。全诗结束两句说：“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无闷”语出《周易·乾卦》，意谓大德之人，避世而无所烦忧。这两句意思是：坚持节操岂止古人能够做到，《周易》所谓“遁世无闷”在今人身上同样可以得到验证！这样，诗的情绪便从进退维谷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以高亢的声调收结全篇。也就在这大约半年之后，谢灵运终于称疾辞职，归隐到始宁的祖居。

在这首诗中，诗人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郁闷，或是比兴，用虬和鸿的潜飞自如来对比自己的进退失据；或是直抒胸臆，诉说独居异乡的孤独；或是以景写情，用生趣盎然的江南春景，来衬托诗人内心的抑郁。

此诗以登池上楼为中心，抒发了种种复杂的情绪。这里有孤芳自赏的清高，政治失意的牢骚，进退不得的苦闷，对政敌含而不露的怨愤，归隐的志趣等等，虽然语言颇觉隐晦，却是真实地表现了内心活动的过程。诗中写景部分与抒情结合得相当密切，并且成为诗中情绪变化的枢纽。对景物的描绘，也体现出诗人对自然的敏感和喜爱，而这正是他能够开创山水诗一派的条件。

（朴石整理推荐）